

田
野
與
文
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香港史研究者施其樂牧師(1918-2008)

· 高添強

懷念施其樂牧師(1918-2008)——默默耕耘的香港基督教
史學家

· 邢福增

施其樂牧師與香港歷史檔案

· 鄭銳達

Carl T. Smith (1918-2008): A Bibliography

· Ma Kin Hang

「保生大帝」考

· 鄭振滿

行業神崇拜：香港粵劇行的華光誕

· 林萬儀

《申報》所見的兩則香港史研究資料

· 林國輝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五十一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紀念施其樂牧師專號」 前言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我們尊敬的施其樂 (Carl Thurman Smith) 牧師於2008年4月7日在澳門主懷安息。

本港三位文史研究者各自撰文表達其對施牧師的尊敬和懷念。雖然高添強和邢福增的文章已分別在《信報》2008年4月12日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通訊》，第十六期 (2008年5月) 刊登，但是，這兩篇文章加上鄭銳達的文章可以充份說明施牧師的史才、史識和史德，故編者把其一併放在這期的通訊，以悼念施牧師。

施牧師對香港史研究的貢獻，與提攜後輩的功勞和用心，在這三編紀念文章中已得到絕對的肯定和表揚，不用編者多作註腳。編者最早接觸施牧師是在華南研究會。在創會的早期，該會每次例會皆安排研究者或會員發表研究心得，施牧師皆會抽空出席，正如他在〈華南研究會十周年紀念刊序言〉中所言，他其實是聽不懂發表者所使用的廣東話，爲了不想與會者因提供即時傳譯而失去分享研究心得的機會，他總努力在扮聽懂發表者的言論。施牧師的目的就是以行動來支持該會的「年青人」，並且不希望因爲自己的出現而阻礙了「年青人」的學習。這點是施牧師令各人敬佩的眾多原因的其中一點。

施牧師爲香港史的研究帶來很多創新和挑戰，當很多研究者仍然著眼於如何以香港史說明中國大歷史之時，例如中港關係、對革命的貢獻

或經濟發展等課題時，施牧師卻把眼光向下、關注本港社區的獨特發展，以及妹仔和婦女等弱勢社群的歷史與生活。這些研究課題到了今天才被人們關注。由於施牧師研究的先創性和深度，今天，在上述研究課題中他的著作仍是不能不被閱讀的作品。

看著施牧師豐富的著作目錄，在敬佩之餘，編者不禁汗顏，只要想想施牧師本人健康的問題，便可以想像到其用功之勤，即使其以高齡移居澳門後，仍然著作不斷，對此，我們任何用以說明著作貧乏之理由，皆變得只是藉口。只要想想在沒有電腦的幫助下，施牧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香港歷史檔案處抄寫資料，再加以分類和儲藏，並且無私地公開給各有興趣者閱讀和使用，這種魄力、精神和對研究的執著，值得我們學習。

很多學者憤憤不平認爲施牧師的香港研究備受忽略，但從上述三篇文章，編者深信施牧師的貢獻及其風骨，早已留在很多人的心中。看其寧願不稍作修改其碩士論文而放棄學位 (見邢文註釋12)，可知學位這些名譽，對於施牧師只是浮雲，他執著的是學術與研究。

即使長輩享壽高齡，離去，總是令人悲痛萬分。

香港史研究者施其樂牧師（1918-2008）

高添強
香港史研究者

剛在3月於澳門度過其九十歲生日的一代香港史研究者施其樂牧師（The Rev. Carl T. Smith），不幸於4月7日在當地鏡湖醫院病逝。對這位半生在香港工作和研究的前輩來說，能活到這把年紀，大概不算憾事。然而筆者對這位良師益友、也是香港史巨人的離去，失落之情仍不免油然而生。

筆者以「一代」和「巨人」來形容施牧師，絕非言過其詞，他為香港史所付出的貢獻，可說前無古人，雖然不能說一定後無來者，不過要超越他的成就，看來相當不容易。令筆者深感敬佩的，是他的研究基本上沒有學術機構支持，四十多年來施牧師孜孜不倦翻閱數之不盡的資料、撰寫文章，都是源自他對香港早年社會的好奇，這份好奇和堅持，大概讓不少專業史學者汗顏吧。

施牧師於1918年在美国俄亥俄州戴頓（Dayton）市出生，大學畢業後進神學院修讀，後加入美國一個差會，於1960年在耶魯大學學習廣東話數個月之後，隨即獲派往香港傳教。抵港後，施牧師先在差會位於屯門的神學院任教，一年後轉往崇基神學院，並在該學院工作至1983年始告退休。

根據施牧師的回憶，當他在神學院開始任教基督教在華（包括香港）歷史時，發現當時的資料只限於傳教士以及他們所作的事工，對華人教徒的情況與處境，幾乎一片空白，這對理解早年教會工作實質幫助不大。為理解早年香港的情況，他開始從各種資料入手，希望從中梳理一些早期教會與華人關係的脈絡，自此施牧師便與香港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施牧師開始研究香港早期發展之時，本地史在學界的研究可說完全不成氣候（其實到今天也好不了多少，長期以來我們對很多重要的題目仍一知半解甚至毫無頭緒，如早期的華人生活、

英國接收「新界」遇到的武裝抵抗、「三年零八個月」等），當時一些華人學者大都沉醉在南宋宗室在香港落難的一幕，對香港的近代發展不聞不問；西方學者只把眼光放在新界的大族上；在大學教授香港史的講師則從一些英國殖民地部的檔案以殖民者的眼光撰寫本地歷史，在這類著作中，華人除了三數位如何東（其實是混血兒）、何啟、孫中山等人物稍稍提及外，其他一概沒名沒姓，什麼面目也沒有。相對於此，施牧師則從檔案和文獻，包括他有機會翻閱的官方報告、憲報通告、田土廳紀錄、地圖、立法局會議記錄、港督與倫敦的通信等，加上其他如中、英文報章、教會檔案、私人通信，甚至遺囑及訃聞等，以及實地考察，把香港不同的發展面貌包括地區歷史、毫不起眼的人物、華人組織等，以生動的形象呈現出來。與當時流行的香港史著作不同，在他的文章中，管治者從來不在顯眼的位置；被認為在香港的發展「舉足輕重」的英商，在施牧師的文章中，也沒有多少的位置。事實上，當我們漸漸認識華人在香港歷史的地位時，這些英商的歷史定位很可能將被修正。

在數十年的研究中，施牧師共抄下了十多萬張以人物為中心的資料卡，這些資料卡今天已成為研究香港歷史的一大寶庫。¹以數量來說，由於參考的史料繁複，施牧師撰寫的文章並不算多，不過其中不少卻屬開創性的題材，把過往官方記錄式的香港史研究方法帶進新的領域，為後進的研究者提出全新的角度閱讀香港的歷史發展，這也是他對香港史研究的一大貢獻。施牧師撰寫過的題材包括過往甚少學者注意的「涉外婦人」（protected women）、華人基督徒以及他們與教會的關係、少數族裔、遺囑研究等；此外，他更以田土廳的檔案，把地區歷史重構起來，這都是以往學界聞所未聞的。

可能由於施牧師不是「正途」出身，更不是史學博士，本地史學界對其一直相當冷淡，很少與其交流香港歷史發展的問題，誠為可惜。十多年前，曾有一本有關香港史學研究的專著出版，編者對施牧師甚至隻字不提，筆者希望這只是編者無心之失！對於學術上的成就，施牧師終於在三年前得到認可，獲得一個榮譽博士的學位，不過這卻不是由本地的大學所頒發，而是隔鄰澳門的一所院校。對一位半生以香港為家，以理解香港歷史發展為己任的研究者來說，這是何等的諷刺，或許，本地的大學對頒授榮譽學位有其特殊的要求吧。

多年來，不少學界人士往往以史料不足為由，而最常見的說法是戰時散佚，把香港史的研究特別是對早年華人社會的理解說成困難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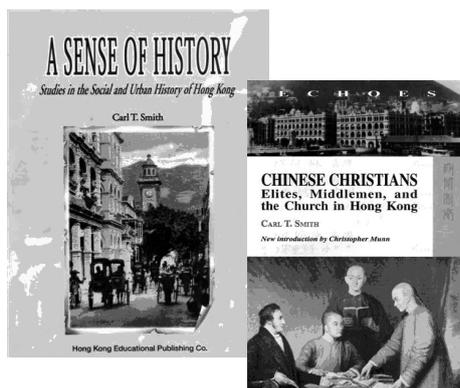
不過從施牧師的研究成果來看，這全都是托辭！可以說，從施牧師的時候開始，香港史的研究已進入了新的階段。讀者若要對香港歷史有新的認識，大可參考施牧師的兩本論文集：*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華人基督徒：精英、中間人與香港教會），以及*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歷史的意識：香港社會與都市歷史的研究）；此外，施牧師的文章亦散見於一些學報，包括《景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等。

註釋

¹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收藏了這些資料卡的複印本供研究者查閱使用。



施其樂牧師（1918-2008）



施牧師的兩本論文集，收集了他從1960年代至1980年代於不同期刊刊登的一些文章。*A Sense of History* 曾譯為中文，名為「歷史的覺醒」，不過可能由於譯者對香港不太熟悉，誤譯之處頗多，讀者須稍加注意。

懷念施其樂牧師（1918-2008）

——默默耕耘的香港基督教史學家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我們尊敬的施其樂（Carl Thurman Smith）牧師於2008年4月7日在澳門主懷安息。

4月9日晚上，筆者突然從盧龍光牧師處收到這個消息，並得悉安息禮拜將於翌日（4月10日）早上在澳門舉行。心裡曾泛起到澳門參加安息禮拜的念頭，但因為當天早上有課而無法成行。巧合的是，我要上的課正是施牧師最擅長的「香港基督教史」。我相信，盡力教好這門課，就是對施牧師最好的悼念與敬意。

雜憶施其樂牧師

施其樂牧師是著名的香港史及香港基督教史前輩。1918年3月10日生於美國俄亥俄州。1940年大學畢業後，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攻讀神道學碩士，1943年畢業後，獲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現時的United Church of Christ）按立牧職，並先後在紐約及費城牧會。1960年，施牧師決定投身海外宣教工作，加入United Board for World Ministries，1961年奉派至香港。1961至62年間，施牧師在中華基督教會位於屯門何福堂的香港神學院任教。1962年香港神學院併入崇基神學院，施牧師一直在此任教，至1983年退休。¹

早於大學本科的時候，筆者已久仰施牧師的大名。遺憾的是，進中大歷史系唸書時，剛好是施牧師退休之年，一直沒有機會在課堂上跟他學習。記得1992年第一次與他見面，跟許多人一樣，是親自上他在美孚的家（也是他的研究室）面聆教誨，獲益匪淺。那次見面，施牧師很關心我的研究興趣。我跟他分享自己三年前完成的碩士論文。由於我們對「中國（華人）基督徒」有共同的關注，因此大家談得十分投契。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大方地讓我翻閱其書架的珍貴藏書，甚至容許我把一些善本書借走。後來又讓我再次上他的家抄錄資料（即使他不在家，只要跟

他的菲籍傭工〔其實是其研究助理〕打個招呼亦可）。他對後學的支持及鼓勵，令我深受感動。

我們共同的興趣是中國基督徒，但那時我未開始投入香港基督教史。95年博士畢業後，我主要專注於中國基督教的研究。大約在1998年間，我那時任教的建道神學院要開設香港基督教史，於是我馬上重讀施牧師的著作。其實，當年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在本地仍未受到重視，可以參考的就只有施牧師及李志剛牧師兩人的研究成果。期間得悉施牧師剛於一年前在崇基神學組開設香港基督教史，再次錯失課堂上跟他學習的機會。後來，從一位曾修讀這科的教會好友取得課程大綱，如獲至寶。毋庸諱言，自己第一次執教香港基督教史時，就是按著施牧師擬定的綱目再作修改。雖然沒有直接受教於他，但他無疑是我在香港基督教研究及教學方面的啓蒙老師。

大約是2001年，我在某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一篇關於香港基督教平房村的論文。午膳時，剛好坐在施牧師旁邊，跟他談及自己最近的研究課題，他馬上給我一些意見。施牧師慈祥和藹的形象，至今仍在我心。2003年第三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學術研討會以「香港基督教史」為主題召開時，主辦單位特別宴請施牧師，向這位老而彌堅的香港教會史資深學者致以敬意和敬禮。當時他已受聘於澳門文化局，把研究重點轉至澳門，大多時間在澳居住。這是我最後一次跟施牧師見面。

施其樂牧師自1961年來港，40多年來默默耕耘，推動香港史及本地基督教史研究。回顧他的學術生涯，在兩方面給我們帶來挑戰：

挑戰一：華人基督徒在哪？

第一，是他對華人基督徒的重視。施牧師曾說，他在1961年來港後，被要求教授中國及香港

基督教史。當時他對這個領域完全陌生，為備課而搜集資料。他很快就對華人基督徒產生濃厚的興趣，這群在殖民地處境皈依基督教的華人深深吸引著他。他們究竟從何而來？基督徒的身分對他們有何影響？他們會否變得更西化？在多大程度上華人信徒離異於傳統文化？不過，當他廣泛閱讀資料時，卻發現傳教士才是文獻的主角，關於華人的資料乏善足陳。後來他在*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一書的自序中，不禁問：「故事的重點是否應放在中國人這邊？」他明白自己並非中國人，對中文資料的掌握亦有限制，但是他卻說：「在備課的時候，我責無旁貸地重視教會發展中的華人層面，多於傳教士的層面。」²因此，施牧師致力於發掘各種各樣涉及華人的資料，重構他們在歷史曾扮演的角色。

得指出，施牧師對「華人」的鍾愛，並不局限於那些在歷史上開創豐功偉蹟的「大」人物（他只寫過三篇關於孫中山的論文）³，更多是藉藉無名的「小」角色。⁴在施牧師的著作中，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華人名字。這些名字，大多是名不經傳的小人物，卻因緣際會地在歷史文獻中留下殘存記錄。施牧師沒有因此而輕視他們，反倒致力重塑他們的面貌，並努力地串連這些個體，再併出一幅更具代表性及解說力的歷史圖像來。

同時，施牧師亦偏愛於歷史上的弱勢及邊緣群體，特別是香港史上的婦女、妹仔、童工等。⁵這種對孤兒婦女的重視，未嘗不可追溯到其基督教背景及牧者關懷。當然，他在協和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特別是受到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影響，⁶孕育他對社會的關懷（他形容自己的思想一直屬「左翼」的）⁷。

挑戰二：動手動腳找史料

第二，是他對史料的重視。施牧師早於十四、五歲時，便有興趣利用族譜和個人資料來研究自己的家庭及社區的歷史，後來更積極參與族譜學的研究。⁸當他來港從事香港基督教史的教學及研究時，這種訓練為他奠下紮實的根基。

曾到訪他家的人，肯定驚訝其多年來抄寫的14萬張資料咭。1961年來港後，施牧師開始在報章、碑銘、教會檔案、遺囑和各類官方刊物中，收集香港、澳門及中國沿海城市有關人物、田土、機關組織及商業方面的資料。他把這些資料一一抄寫在資料咭上，再按類排列。⁹他曾展示一些給我看，上面寫上華人的名字，以及一些背景，以及可追縱的資料。部分關於華人基督徒的資料（包括生卒年份、宗派背景、籍貫等），更是他在基督教墳場的墓碑上抄寫下來的。認識施牧師者都知道，他身軀龐大，很難想像他在墳場的梯級上落，渾身大汗地作記錄的模樣。傅斯年曾形容治史者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施牧師成為這句話的最佳註腳。

此外，施牧師在重構教會歷史時，從沒有忽視檔案的價值。他先後多次利用休假的機會，到訪英國、美國、瑞士及德國的差會檔案館，查閱香港基督教史上的「老牌宗派」（聖公會、倫敦會、浸信會、巴色會、公理會、循道會）的差會檔案。¹⁰事實上，施牧師對「華人」的重視，並不代表他漠視傳教士的角色。相反，他的研究清楚展現出在香港的獨特歷史處境下，傳教士及華人信徒間的互動關係。

雖然施牧師十分執著原始史料，但他的研究成果卻不限於敘事，反倒是企圖藉著史料的整合，提出對歷史事件的解說。他曾說：「在叢林中望著一顆樹或灌木，您會感到迷失。但當您開始看到這顆樹或灌木與鄰近環境的關係時，整個生態圖像就頓然呈現出來。」¹¹當然，他這種治史的方法——通過搜集及整理大量史料來重構史實及解釋，對於要求石破天驚的史論的人而言，並不吸引。¹²不過，施牧師對史料的執著，在提醒我們，在沒有充份搜集資料、整理分析之前，不應急於為歷史提出宏大的解說及論斷。這些建基於片面事實的解說好像十分吸引，但最終是經不起歷史事實的考驗。基督教傳入香港已超過160年，我們好像擁有160多年的歷史，但其實仍沒有建構歷史（constructed history）。

愛上歷史，書寫歷史

四十多年來，施其樂牧師在香港史及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領域裡默默耕耘，在荒蕪的園地作開墾及撒種的工作。作為一位來自美國卻以香港為家的教育傳教士，他對香港的關愛，委實令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感到慚愧與汗顏。我們對本地的社區及教會歷史的了解及認識有多少？在「集體回憶」愈益受到香港社會重視的當下，我們亦須致力重構基督教在香港的「過去」，「書寫」更多香港基督教的歷史。您願意回應施牧師給我們的挑戰嗎？

註釋

¹ 關於施牧師的生平，參Christopher Munn, "Introduction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KU Press, 2005), xix-xx. 另 May 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3-148。另李家駒、黃文江，〈施其樂牧師：傳教士成為歷史學者〉，《思》，期31（1994年5月）。本文獲香港基督徒學會批准，轉載於《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通訊》，期4（2008年5月）。

關於施牧師與崇基的關係，可從神學院的檔案得知。自1962年開始，他在崇基神學院任教。1968年，崇基神學院加入崇基學院，成為哲宗系下的神學組。施牧師成為神學組唯一的全時間講師，至1970年休假回國。1972至76年起任神學組部分時間講師，76年起為榮譽講師（Honorary Lecturer），至1983年退休。1995至1999年間，任神學組的副研究員。期間在1996至1997學年任教香港基督教史。

²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xiii.

³ Smith, "Sun Yat-sen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Hong Kong," *Cheng Feng* 20:3 (1977): 153-165; "Sun Yat-sen's Middle School Days in Hong K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Cheng*

施牧師曾在一篇回顧自己研究經驗的文章的總結時，形容他所鍾愛的歷史研究：

這是我的興趣與喜樂，並將不斷給我的生命賦予重大意義。……它豐富我的生命，並成為我的祝福。¹³

作為治史者，筆者心裡由衷地認同施牧師的感受，謹以此與諸位互勉。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園地如果日後能夠開花結果，我們不要忘記這位為我們開墾及播種的默默耕耘者。

Feng 21:2 (1978): 78-94; "Sun Yat-sen's Baptism and some Christian Connections," *Cheng Feng* 22:4 (1979): 170-189.

⁴ Carl T. Smith, "An Early Hong Kong Success Story: Wei Akwong, the Beggar Boy," *Chung Chi Bulletin* 45 (1968): 14.

⁵ Carl T. Smith, "Ng Akew, one of Hong Kong's Protected Women," *Chung Chi Bulletin* 46 (1969): 13-17, 27; "The Chinese Church, Labour. Elites and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HKBRAS)* 21 (1981): 91-113; "The First Child Labour Law in Hong Kong," *JHKBRAS* 28 (1988): 44-69; "Protected Women in the 19th Century Hong Kong," in *Women and the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Collusion ad Escape among Chinese Women*, eds. by Suzanne Meyers & Maria Jaschok (Hong Kong: HKU Press, 1994), 221-237.

⁶ 李家駒、黃文江，〈施其樂牧師：傳教士成為歷史學者〉。

⁷ May 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148.

⁸ 他於1950至60年，擔任美國賓州族譜學會（Genealog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的榮譽秘書長及研究員。曾著有Reference Guides for Course in Genealogical Methods (1959, 1973)。

⁹ 〈比港人還了解港人的「鬼佬」牧師〉，《明

報》，1996年8月3日。另香港歷史檔案館，〈「施其樂牧師資料集」檢索系統〉，《華南研究中心通訊》，期15（1999年4月），頁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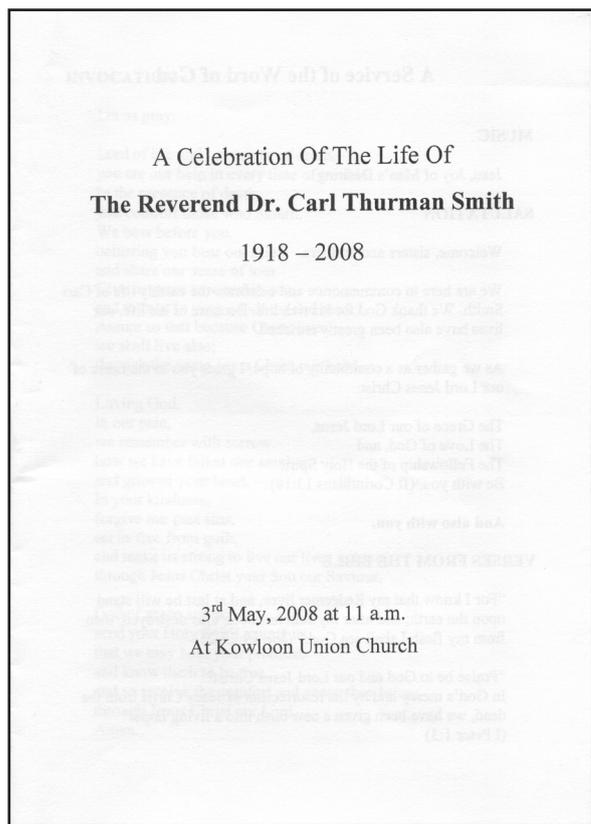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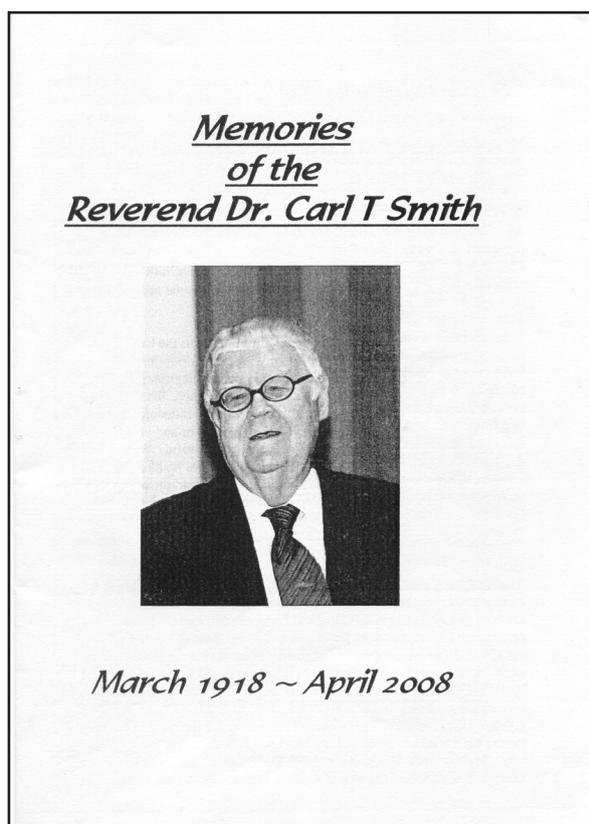
¹⁰Carl T. Smith, “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 in Carl T. Smith,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 Co., 1995), 308-319.

¹¹May 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147.

¹²施牧師曾說，在1965至66年間，他再回到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撰寫題為 “Scholars and Scholars: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China Miss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ts Result” 的碩士論文，但在答辯時被要求改寫，把部份正文的資料移至附錄。施牧師由於沒有遵從，最後沒有取得學位。(Carl T. Smith, “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 pp310-311.) 該論文長達270頁，共四部分11章，施牧師曾計劃以專書形式出版，但最後沒有成事。書稿的大綱現存於崇基學院神學院檔案。

¹³Carl T. Smith, “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 315.



施其樂牧師與香港歷史檔案

鄭銳達¹
香港史研究者

著名的本地史家施其樂牧師（Reverend Carl T Smith）於本年4月7日逝世。施牧師令人津津樂道的實在很多，包括他突出的形象——高大的身材、雄厚的聲亮、開懷的笑聲；他不會數算地待人，對從事研究的同道中人，不論對方是甚麼資歷、年齡及與他認識深淺，他總是興致勃勃地聆聽及討論，很多時更會熱心地協助和分享資料；他對研究有高度熱忱，默默地從各種原始資料著手，發展他對本地史不同範疇的見解，同時亦建立了他個人的龐大資料庫。²

施牧師從事研究中尤其著重運用歷史檔案（Archives / Public Records），在長久的教學和研究生涯中，他每每不放過可以閱覽檔案的機會，在休假時候亦不忘到各地檔案館查找檔案，故此他踏足過多個國家的公私檔案館，其中香港的歷史檔案館（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更是他長期駐足的地方。³或許，我們亦可嘗試回顧施牧師一些利用香港歷史檔案⁴所作的研究，從中懷緬這位本地史學界的巨人，順帶談談香港歷史檔案的延續問題。

研究舉隅

筆者拿著施牧師的一本論文集——*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很快的翻過一遍，其中大量運用香港歷史檔案的有以下四篇：

（1）“*Hong Kong Chinese Wills: 1850 – 1890*”⁵

施牧師利用了香港歷史檔案館的遺囑檔案（檔案類別編號144），他將其中自1850至1890間共約300份華人遺囑全數翻閱後作分析。香港政府在1856年通過了華人遺囑認證條例（Chinese Wills Validation Ordinance），自此香港華人把其所立的中文遺囑拿到政府登記存檔的數目漸增，而這

些在19世紀的香港華人遺囑亦得以在政府的檔案中保存下來。施牧師認為這些遺囑對研究的重要性一直受忽略，他則試圖從中看立遺囑人的一生的回顧、管理財產的方式、受託管理遺產人與立遺囑人的關係、立遺囑人如何安排家人的生計和家事、立遺囑人從事的商業活動和商業網絡、價值觀、家庭結構、婦女的地位等。

（2）“*Wan Chai: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⁶

施牧師這篇文章講述了灣仔自香港開埠至1980年代的發展。他首先重構1840年代時最早期的發展，主要是今春園街以西的一段皇后大道東；然後按區域地更微觀地描繪灣仔四個區域的發展：（1）皇后大道東以南（至堅尼地道）；（2）皇后大道東以北（至莊士敦道）；（3）摩尼臣山一帶；（4）莊士敦道 / 軒尼斯道至告士打道（1920年代的新填海區）。讀者會從中明白今天灣仔是一個新與舊、中與西交雜和集合工商住休閒娛樂於一身的歷史原由。施牧師認為香港在急速發展同時需要連繫上過往歷史，灣仔的夾雜生態既是一種與歷史的連繫，也是追尋身份的一種表現。施牧師在這篇文章中主要利用的香港歷史檔案包括檔案類別編號38、58、109和204。

（3）“*Sham Shui Po: From Proprietary Village to Industrial-Urban Complex*”⁷

在本文中，施牧師詳細地敘述深水埗區自19世紀至戰前的發展。他發現新界（屏山、錦田和龍躍頭）鄧氏其實是深水埗的大地主；藉著收藏於歷史檔案館的一些有關深水埗的土地契約和文件，他重構深水埗土地佔有情況，從中我們亦可看見清中葉以後該區的複雜租佃關係。隨著英國於1860年佔領九龍半島及1898年租借新界，深水埗這個位於舊九龍以北的地區亦逐步發展，包括

深水埗土地投資公司 (Shamshuipo Land Investment Co. Ltd.) (1902-1914) 成立、英政府收地、賣地和仲裁土地糾紛、來自港島發展商的收購和發展、移山填海、道路和渡輪航線的擴展，深水埗由一個鄉村轉化為一個小市鎮，成為九龍市區的一部份。施牧師在本文主要利用的歷史檔案包括檔案類別編號490、265、58和95。

(4) “*Hung Hom: An Early Industrial Village in Old British Kowloon*”⁸

在這篇較短的文章裡，施牧師簡略地勾劃紅磡自英國開始管治開始 (1860) 至19世紀末的發展。黃埔船塢在英國佔據九龍半島不久後即成立，是促成紅磡由農業轉化為以工業為主地區的關鍵因素。1884年一場大火進一步加速紅磡的發

展，政府規劃新地段作拍賣，今天紅磡的主要街道開始出現。區內的兩個主要廟宇——觀音廟和北帝廟，在發展中雖無可避免地被搬遷，但廟宇在凝聚社區與街坊，以致推進社區活動和提供社區服務上仍扮演重要角色。施牧師在本文主要利用的歷史檔案包括檔案類別編號183、38和58。

綜合以上四篇論文，主題集中於香港社會史和地區史，關注的社會階層由社會精英至普羅大眾，探討的地區雖以最早割讓與英國的港島和九龍半島市區為主，但亦沒有忽視其與附近地區 (特別是1898年後亦歸入英國管治的新界和香港原來所屬的廣東新安縣) 的各種連繫，這亦頗能反映施牧師一貫的專長、興趣和史觀。

檔案的運用

施牧師在以上四篇論文中運用了多種不同資料，但正如上述，香港歷史檔案是當中運用最多的原始材料，包括的檔案類別有以下9個：

檔案類別編號 (HKRS No.)	檔案類別名稱 (Series Title)	數量	涵蓋年份	檔案產生部門	檔案移交部門	簡要內容	備註
144	Probate Jurisdiction Will Files	28,614 files	1840-1990	Probate Registry, Supreme Court	Probate Registry, Supreme Court	包括經認證的遺囑，中文遺囑都會附有英文翻譯。	是檔案館早期收獲的檔案之一，其中年期最早的一批於1974年在夏慤道消防局發現。(施牧師說是在舊海軍船塢發現，與檔案館資料略有不同。)
38	Rates Assessment, Valuation and Collection Book	1,508 volumes	1858-1983	(1) Assessor and Collector of Police and Lighting Rates; (2) Valuator, Treasury Department; (3) Assessor of Municipal Rates, Treasury Department	(1) Records Section, Hong Kong Division,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2) Rates Section, Treasury Account Branch, Treasury	每本差餉冊內都列出被評估/徵收差餉物業的資料，包括地點、地段描述、物業描述、業主姓名、物業用途、應課差餉租值。	

58	C.S.O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 Files in the Land Office	12,633 files	1853–1953	(1) Land Office, Surveyor General's Department; (2) Land Office, Supreme Court	Land Office, Registrar General's Department	關於土地事宜的來往公文。	
95	Files Relating to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of Companies	417 files	1891–1952	(1) Registrar of Companies, Supreme Court; (2) Companies Registry, Registrar General's Department	Companies Registry, Registrar General's Department	關於公司清盤的書信文件、公司紀錄等。	
109	Minutes of Meetings of the Licensing Board	1 volume	1919–1941	Licensing Board	General Registry, Secretary's Office, Supreme Court	有關審批酒店及相關牌照申請的會議紀錄。	
183	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quatter Board	2 volumes	1892–1909	Squatters Board, Land Office, Supreme Court	Land Registry, Registrar General's Office	有關寮屋管理的會議紀錄、來往公文和報告。	
204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Open Spaces	6 volumes	1898–1905	Sanitary Board	Library Section, Administration Unit, Colonial Secretariat	有關審批屋宇外圍空地申請的來往公文、報告和會議紀錄。	
265	Surrendered Title Deeds	23,695 files	1844–1972	Land Office, Surveyor General's Department	Land Office, Registrar General's Department	交回土地業權契據，包括官契、土地買賣和轉讓文件、土地調查和地圖等。	
490	Memorials	36,100 files	1844–1945	(1) Land Office, Surveyor General's Department (2) Land Office, Supreme Court	(1) Land Registry, Registrar General's Department (2) Microfilming Section, Technical Services, Land Registry	有關土地買賣的註冊摘要。	

資料來源：

香港歷史檔案館，歷史檔案線上目錄，2008年6月7日，（http://www.grs.gov.hk/PRO/srch/english/sys_archive.jsp?language=english）。

施牧師以靈活的方法運用以上檔案，有時會將檔案資料數量化，有時會重點陳述和分析檔案中包含的典型事例或詳細個案，有時會抽取不同時期的關鍵資料作系統陳列和比較。雖然我們可說這些只是一般歷史研究和分析資料的基本方法，但從上述四篇論文對資料的鋪排，我們幾乎可肯定施牧師至少把以上9個檔案類別中19世紀至戰前部份都翻過一遍，並把當中有用資料抄錄、累積和整理。要知以上9個檔案類別的檔案數量（以卷、冊或條目數

量來說）都非常大，任何人要從中整理出相關的資料和人物關係，必然要極之勤力、有持久耐性和肯下苦功，並且要有很強的記憶、觸覺和聯想，從而判斷檔案資料對其研究的作用。施牧師就是具備這些超於常人的能耐。

當然，施牧師不會僅僅利用香港歷史檔案作他的研究，單就以上述四篇論文觀之，他還有利用外國有關香港的歷史檔案、教會檔案、早期香港教會人士的筆記及著作、報紙、政府出版報告

及公佈等。另外，本文雖只舉施牧師的四篇論文作例，但實際上施牧師在很多其他研究，包括他同樣擅長的教會史的研究中亦有利用香港歷史檔案。⁹ 這都說明施牧師能掌握和靈活利用不同類型的史料作歷史研究。

檔案的延續性

回顧上述四篇論文，除了讓我們觀摩施牧師利用香港歷史檔案作史學研究的能耐，也引伸另一個有關檔案保存的問題——既然以上9個檔案類別對於研究香港社會史和地區史等範疇有這麼大的潛在價值，它們能否被有效地保存和利用？我們應關注的，除了是現在已保存在香港歷史檔案館的那部份「舊檔案」外（即上表列出的部份），還有是這9個檔案類別的「新檔案」以至還未產生的檔案（即還未移交至歷史檔案館的部份），因為它們的保存與否，直接影響今後的學者能否好像施牧師那般利用它們作新的香港社會史和地區史的研究。

有關檔案的保存與否首先牽涉檔案的鑒定問題。任何歷史檔案館在鑒定檔案是否應予保留都有一套標準和考慮因素，例如有關檔案能否反映檔案產生機構的主要職責、決策和措施，能否協助機構將來的運作，能否保障有關個人或團體的權益等。雖然公眾的興趣和學術研究的趨勢很難完全預測，但歷史檔案的預期研究價值仍是檔案鑒定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就以上述9個檔案類別而言，施牧師的研究正好肯定它們對研究的作用和永久保留價值。

既然如此，以上9個檔案類別的「新檔案」最終能否被歷史檔案館保存下來？如果以上表所列資料作初步分析，情況似乎並不太確定。就以檔案的「涵蓋年份」¹⁰ 來看，有4個檔案類別（檔案類別編號109, 183, 204 & 490）的年份僅至戰前或戰時，其餘5個檔案類別的年份下限由1950年代至1990年。我們不禁會問：「涵蓋年份」下限以後的檔案究竟在哪裡？我們會理解香港經歷二次大戰，戰前檔案可以倖存的並不多，而一些得以倖存的檔案都各自有其輾轉的經歷，最早期的一批遺囑在1974年竟發現於一所消防局內只是我們所

知的其中一則。但是，沒有戰亂的干擾又是否可以保證有保留價值的歷史檔案得以保存？

從上表的資料也可發現，一個檔案類別可能會有多於一個的檔案產生部門和移交部門，這說明在同類檔案的長久「生命」中，它們可能經歷各種政府行政變化，包括組織重組和職能重組，帶來了新部門產生、舊部門完結或廢除及職能的轉移，當中有關的檔案會因應各項重組變化而在部門之間移交。現行機制能否確保移交是有序地進行？一些有價值的檔案可否及時移交至歷史檔案館作永久保存？即使在沒有行政變化時，部門會否坐擁著一些已非日常公務需要的舊檔案，而遲遲不提交至檔案館鑒定，甚至自行將檔案銷毀？這些因素都促成歷史檔案館能否持續地接收一些有價值的檔案。要確保有歷史價值的政府檔案能夠及時移交至歷史檔案館永久保存，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現有政策和機制，甚至考慮立法以釐定歷史檔案館和各部門在保存香港歷史檔案上的法律權力和責任。

結語

施牧師雖然已經離去，但他留給我們的東西實在很多，當中包括了他在本地史多個範疇中紮實和開創性的研究、他累積多年從眾多文獻中抽取的豐富資料；還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為我們活生生地示範如何利用好像歷史檔案一般的「硬資料」作歷史研究。施牧師對研究的興趣、專注和勤力就成為了他利用歷史檔案的不二法門，這也是我們今後利用歷史檔案作研究需要注意和學習的地方。

施牧師憑藉歷史檔案得以認識自己和社會，他自然深明歷史檔案的重要性。在施牧師一篇回憶中，他自述早年從香港多處（包括被人遺棄的故紙堆中）徵集得一批教會檔案，但最終這批檔案卻沒有被保存下來，他為此感到無限痛惜。¹¹ 同樣，我猜想施牧師也必定希望香港的歷史檔案能夠繼續完善，各個機構都珍惜本身的歷史檔案，讓未來的學者和社會大眾有機會從中研究和了解香港社會的過去。

註釋

- ¹ 筆者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現時任職於香港政府檔案處，曾負責協助歷史檔案整理工作。筆者認識施其樂牧師始自研究生時期。此篇懷念文章，筆者是以施牧師的讀者和後學身份，及以一個檔案和歷史工作者的角度去撰寫。
- ² 當中包括香港歷史檔案館的「施其樂牧師資料集」。見香港歷史檔案館，2008年6月8日，（http://www.grs.gov.hk/ws/tc/ps_online_cata_csc.htm）。
- ³ Carl T. Smith, “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 in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308 – 315.
- ⁴ 本文所指的香港歷史檔案是收藏於香港歷史檔案館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的檔案，它們主要是被鑒定為需永久保存的政府檔案。
- ⁵ Carl T. Smith, “Hong Kong Chinese Wills: 1850 – 1890,” in *A Sense of History*, 3 – 37.
- ⁶ Carl T. Smith, “Wan Chai: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A Sense of History*, 108 – 162.
- ⁷ Carl T. Smith, “Sham Shui Po: From Proprietary Village to Industrial-Urban Complex,” in *A Sense of History*, 163 – 202.
- ⁸ Carl T. Smith, “Hung Hom: An Early Industrial Village in Old British Kowloon,” in *A Sense of History*, 203 – 210.
- ⁹ 施牧師提到政府檔案中亦包含很多教會物業、人物和學校的資料，是研究教會史的重要材料。
- Carl T. Smith, “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 in *A Sense of History*, 311 – 312.
- ¹⁰ 要說明的是，「涵蓋年份」只說明該檔案類別中最早和最後一份檔案的年期，當中包含的檔案的年期差距可以很不一致。另外，「涵蓋年份」只是涵蓋那些檔案館已完成整理及可供公眾查閱的檔案；當同類別的新接收檔案完成整理後，「涵蓋年份」會被更新。因此，「涵蓋年份」可作為館藏的一個指標，但並不一定反映檔案館已接收的檔案。此外，個別檔案「涵蓋年份」的下限（即檔案的最後一份檔案的日期或檔案的封存日期）是現時香港歷史檔案館決定檔案可開放年期的一項依據，檔案一般是以檔案封存日的30年後開放讓公眾利用；至於未滿30年的而已完成整理程序的檔案也會顯示於檔案館的檔案目錄，公眾如希望查閱未滿30年的檔案需特別申請。至於利用具個人資料的檔案則需受保障個人私隱的條例約束。詳情見香港歷史檔案館，2008年6月8日，（http://www.grs.gov.hk/ws/tc/ps_online_cata.htm）。
- ¹¹ 經歷檔案失落，施牧師總結說：“……Archival material should be deposited in an institution where their care and preservation will be ensured. Unfortunately, my own efforts on the last point was misplaced.” Smith, “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 in *A Sense of History*, 306 – 307.

Carl T. Smith: A Bibliography

Ma Kin Hang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 Carl T. Smith died in Macao on Monday, April 7, 2008. This is a compilation of his writings.

Bibliography

The Lands Office of the Registrar-General's Department: A Source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S.N.

"Early European Buildings in Hong Kong," *Chung Chi Bulletin* 38 (1965): 14-20.

"Scholars and Scholars: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China Miss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t's Results," S.l.: S.N., 1965.

"Commissioner Lin's Translators," *Chung Chi Bulletin* 42, no. 29-36 (1967).

"A Heidegger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y of Lao Tsu," *Ching Feng* 10, no. 2 (1967): 5-19.

"Radical Theology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Ching Feng* 10, no. 4 (1967): 20-33.

"An Early Hong Kong Success Story: Wei Akwong, the Beggar Boy," *Chung Chi Bulletin* 45 (1968): 9-14.

"A Study of the Missionary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Samuel R. Br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faith Encounter," *Ching Feng* 12, no. 2 (1969): 2-19.

"The Gillespie Brothers: Early Link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alifornia," *Chung Chi Bulletin* 47, no. 23-28 (1969).

"Ng Akew, One of Hong Kong's 'Protected Women'," *Chung Chi Bulletin* 46 (1969): 13-27, 27.

"A Register of Baptized Protestant Chinese, 1813-1842," *Chung Chi Bulletin* 49 (1970): 23-26.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Chung Chi Bulletin* 48 (1970): 26-32.

"Dr Legge's Theological School," *Chung Chi Bulletin* 50 (1971): 16-22.

"Americans Buried at Macao, China," *National Genealogical Society Quarterly* 59, no. 2 (1971): 114-117.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10, no. 1 & 2 (1971): 81-95.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1 (1971): 74-115.

- "An Historical Survey of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Dayton, Ohio," *Chung Chi Bulletin* 54 (1973): 30-33.
- "Idols on a School Hill: The American Board School for Chinese Boys at Singapore, 1835-1842," *Chung Chi Bulletin* 55 (1973): 28-30.
- "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3 (1973): 133-139.
- "The Chinese Church in a Colonial Setting: Hong Kong," *Ching Feng* 17, no. 2 & 3 (1974): 75-89.
- "Programme Notes for Visits to Old Forts of Hong Kong Island (Urban Areas), and to Kowloon, in 1974,"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4 (1974): 196-230.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1849-1974: A Brief History and the 1974 List of Church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cial Welfare Centres* (Hong Kong: Diocesan Office, 1974).
- "English-educated Chinese Elite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Hong Kong," In *Hong Kong: The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 and Life in the Towns*, ed. Marjorie Topley (Hong Kong: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5), 65-96.
- Smith, Carl T. and James Hayes. "Hung Hum: An Early Industrial Village in Old British Kowloo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5 (1975): 318-324.
- "Early American Trade in China and Hong Kong: Russell and Company and the Houqua Family." *Hong Kong Amcham* 7, no. 7 (1976): 14-17.
- "Notes on the Earliest Missionaries in Hong Kong," *Ching Feng* 19, no. 3 & 4 (1976): 24-28.
- "Chan Lai-sun and His Family: A 19th Century China Coast Famil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 (1976): 112-116.
- "Notes on Friends and Relatives of Taiping Leader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 (1976): 117-134.
- "Notes on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 (1976): 263-280.
- "A Glance Backward: Auditoria, Artistes and Amateur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rts Centre Opening Celebrations 1977*, 29-33.
- "The Early Hong Kong Church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Patterns," *Ching Feng* 20, no. 1 (1977): 52-60.
- "The Protestant Church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Status in the 19th Century China," *Ching Feng* 20, no. 2 (1977): 109-115.
- "Sun Yat-sen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Hong Kong," *Ching Feng* 20, no. 3 (1977): 153-165.

"Sun Yat-sen's Middle School Days in Hong K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Ching Feng* 21, no. 2 (1978): 78-94.

"Sun Yat-sen's Baptism and Some Christian Connections," *Ching Feng* 22, no. 4 (1979): 170-189.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Compradors," In *HSBC Conference*. Centre of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1.

"The Chinese Church, Labour and Elites and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 (1981): 91-113.

"The Hong Kong Amateur Dramatic Club and Its Predecessor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2 (1982): 217-251.

"A Look at Ching Feng Over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Ching Feng* 25, no. 4 (1982): 195-205.

"Compradors of Hong Kong Bank," In *Eastern Bank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ed. Frank H. H. Ki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3), 93-111.

"The Adaption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to a Chinese and Colonial Situation," *Ching Feng* 26, no. 2 & 3 (1983): 75-98.

"Shamshuipo: From Proprietary Villages to Industrial Urban Complex," In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ed. David Faur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4), 73-105.

"Congregational and Visitors' Registers at Tao Fong Shan," In *Karl Ludvig Reichelt: Missionary, Scholar and Pilgrim*, ed. Eric J. Sharpe (Hong Kong: Tao Fong Shan Ecumenical Centre, 1984), 203-206.

"Notes for a Visit to the Government Cemetery at Happy Valle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5 (1985): 17-26.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1st e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German Speaking Community in Hong Kong 1846-1918,"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4 (1994): 1-55.

"Protected Women in 19th-Century Hong Kong," In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Servitude and Escape*, eds. Maria Jaschok and Suzanne Mie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1-237.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 Co., 1995).

"The Wai Sing Lottery and Its Network of Macau, Canton and Hong Kong Capitalists," In *The Rise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 in China from Ming to Present*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Armenian Strands in the Tangled Web of the Opium Trade at Macau and Canton,"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 Zexu, the Opium War and Hong Kong* (Hong Kong: Lin Shi Shi Zheng Ju Xianggang Li Shi Bo Wu Guan : Lin Zexu Ji Jin Hui : Zhongguo Shi Xue Hui, 1998).

Smith, Carl T. and James Hayes, "Nineteenth Century Yaumatei," In *In the Heart of the Metropolis: Yaumatei and Its People*, ed. P. H. Has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K.) Company Ltd., 1999), 96-109.

"Wanchai: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ed. David Faur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7-209.

"The China Trade Painters' Portrayal of Macau's Praia Grande," In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Symposium: Picturing Cathay: Maritime and Cultural Images of the China Trade*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Sino-Indian Interaction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Parsees, Armenians and Muslims in Macao,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In *Distinguished Fellow Award Ceremony for Rev. Carl T. Smi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Programme and China-India Project,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2003.

"An Eighteenth-Century Macao Armenian Merchant Prince," *Review of Culture* S. 3, no. 6 (2003): 120-129.

Smith, Carl T. and Paul A. Van Dyke, "Armenian Footprints in Macao," *Review of Culture* S. 3, no. 8 (2003): 20-39.

"Four Armenian Families," *Review of Culture* S. 3, no. 8 (2003): 40-50.

"Musli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1700 to 1930," *Review of Culture* S. 3, no. 10 (2004): 6-15.

"Parsee Merchan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view of Culture* S. 3, no. 10 (2004): 36-49.

"Preface to Tenth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of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 華南研究會編輯委員會 (1998), 《學步與超越》(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 2004), 頁i-ii。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Carl Smith's Index Card Collection is deposited at The Hong Kong Records Office. (Website: http://www.grs.gov.hk/PRO/srch/english/sys_archive.jsp).

Carl Smith donated many of his works to the Archives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with over 300 manuscripts and monographs including yearbooks and anniversary reports of som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as well as biographies of Christian leaders and missionaries.

「保生大帝」考

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史系

「保生大帝」原名吳本，又稱「吳真人」、「吳真君」、「大道真君」，閩台民間一般稱為「大道公」。根據宋人有關記述，吳本的生存年代大約為北宋太平興國四年至景祐年間（979-1037）。¹地處漳泉交界的同安、龍溪（今廈門海滄）一帶，是吳本的家鄉及其主要活動地區，也是吳本信仰的發源地。民間傳說，吳本生平以行醫為業，受到了漳泉民眾的敬仰和崇拜，生前已被視為「神醫」，死後則被奉為「醫神」，以致「鄉之父老，私謚為醫靈真人」²。南宋初期，由於漳州緝紳顏師魯和泉州緝紳梁克家的推薦，吳本被納入官方祀典，賜「慈濟」廟號。在《宋會要輯稿》中，可以查到有關「慈濟廟」的以下記載：「廟在同安縣，〔神〕忠顯侯。嘉定元年五月，加封忠顯英惠侯。」³這是宋代賜封吳本的直接證據。至於吳本的「保生大帝」封號，則從未見諸正史記載，很可能是後人杜撰的。考察「保生大帝」封號的由來，有助於探討宋以後民間信仰的演變趨勢，揭示神明正統性的建構過程。

在福建地方文獻中，泉州人何喬遠於萬曆四十一至四十四年（1613-1646）編纂的《閩書》，最早記載吳本的「保生大帝」封號。在《閩書》的《靈祀志》中，並未對「慈濟宮」作專門記載，而在《方域志》「白礁」這條目下，卻記述了吳本的歷代封典與靈異故事。他在摘錄宋人楊志和莊夏的碑文之後，補寫了以下內容：

曆宋累封普祐真君。皇朝永樂十七年，文皇后患乳，百藥不效，一夕夢道人獻方，牽紅絲纏乳上灸之，後乳頓瘥。問其居止，對云某所。明遣訪之，云：「有道人自言『福建泉州白礁人，姓吳名本』，昨出試藥，今未還也。」既不得道人所在，遂入閩求而知之。

皇后驚異，敕封「恩主昊天醫靈妙惠真君、萬壽無極保生大帝」，仍賜龍袍一襲。⁴

《閩書》的上述記載，自然只是神話，而不是信史。然而，在明以後的各種地方志書和通俗讀物中，幾乎都轉錄了《閩書》的上述資料，其影響極為深遠。那麼，《閩書》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呢？

近年來，筆者與丁荷生教授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發現了保存於南安縣豐州慈濟宮的兩方碑記，對於追尋「保生大帝」的由來頗有助益。其一為立於萬曆三十年（1602）的《吳真人世修道果碑》⁵，其二為立於順治三年（1646）的《敕封仁濟醫局江仙君碑記》⁶。通過比較《閩書》與《吳真人世修道果碑》的相關記載，不難看出二者的相似之處。此碑在記述吳本「醫帝后，線頭察脈，隔屏灸乳」等靈異故事之後，又列舉了宋明王朝的歷次賜封：

孝宗乾道三年，賜「慈濟」宮額。甯宗慶元二年，封「忠顯侯」。嘉定元年，封「英惠侯」。理宗寶慶三年，封「康佑侯」；端平二年，封「靈佑侯」；嘉熙二年，封「正佑侯」；四年，封「沖應真人」；寶祐五年，封「妙道真君」。度宗咸淳二年，封「孚惠真君」。恭宗德祐元年，封「孚惠妙道普祐真君」。國朝太祖洪武五年，封「昊天禦史」；二十年，封「醫靈真君」。成祖永樂七年，封「萬壽無極大帝」；二十一年，封「寶生大帝」。仁宗洪熙元年，封「恩主昊天金闕禦史、慈濟醫靈沖應護國孚惠普祐妙道真君、萬壽無極大帝」。

上述的十五次賜封，只有前三次見諸正史記載，其餘可能都是後人虛構的。尤其是明王朝對吳本的五次賜封，都是很可疑的。明洪武初年，曾要求地方官員申報各地「應祀神祇」，由朝廷統一確認其封號及祀典。因此，吳本於明初再次納入官方祀典，這是有可能的。不過，明代規定民間諸神皆稱之為「真人」，如果加封吳本為「昊天禦史」、「醫靈真君」，並不符合當時的禮制。至於洪熙年間賜予吳本的封號長達30字，甚至連「恩主」、「大帝」之類的尊稱都用上了，其崇尚程度可謂無以復加，更是令人難以置信。

由於此碑立於《閩書》成書之前，而豐州就在泉州郊外，何喬遠很可能讀過此碑，並在《閩書》中採納了有關資料。當然，何喬遠可能也認為這些「封號」太離譜了，因而並未全部採納，又把明王朝的「封號」刪改為「恩主昊天醫靈妙惠真君、萬壽無極保生大帝」，補充了永樂十七年「醫帝后」的具體細節，試圖使之更為合乎情理。

何喬遠是明末福建的大儒，曾經歷任刑部主事、禮部郎中、光祿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左通政、太僕卿，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立朝正直敢言，三度貶官去職，所著《閩書》及《名山藏》皆享有盛譽⁷。那麼，他為何採納出自民間的碑刻資料，為吳本杜撰了「保生大帝」的封號呢？筆者認為，這可能是由於明初禁止民間舉行迎神賽會等宗教活動，使地方神崇拜失去了合法性依據。因此，在明後期吳本信仰的復興過程中，有必要借助於虛構本朝的封號，使之具有新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其實，前人早已指出：「按史，文皇后崩於永樂七年，以後竟虛中宮，安得十七年有後可病乳來？」更為可疑的是，所謂吳本為皇后治病的故事，「與靈濟二徐真人夢中授藥治文皇疾相類」⁸。這就是說，《閩書》記載的吳本靈異故事，實際上是福州徐真人神話的翻版。然而，後人為了論證吳本信仰的正統性，仍然不惜以訛傳訛，而吳本的「保生大帝」稱號也因此不脛而走。

《吳真人世修道果碑》的立碑者為「會首」吳孔道等26人和「會信」黃鳴鏞等3人，可能是當

地民間崇拜吳本的宗教社團。值得注意的是，此碑碑文是以降箕的形式書寫的，而且主要講述吳本得道成仙的神話故事，集中地反映了明代地方教派對吳本信仰的影響。茲摘引如下：

明萬曆壬寅年三月十五日，仁濟仙官江聞茲香信呼魂，攝箕筆紀吳真人世修道果，庠生謝甲先和南書。

嘗聞維嶽降神，鐘而為人。其生也，挺然異於夷儔；其化也，不與草木朽腐。因而二五凝精，布炁存神於十方，體天運道於無極。煥然其有文章，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神明之宗。闡教造化，弘諸大道，世世廟食，而常自然者，惟慈濟吳真君之神乎？父吳通四十八，母黃氏三十八，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母夢見白衣長齋清素下降，覺而有孕。至四年己卯三月十五辰時，誕生於漳。生時，五老慶誕，三台列精。名曰本，字華基，號雲衷。世居泉郡，而職登禦史，時乃退爵修真，誓以濟利為人，道全德備，善行清隆。幼不美，長不娶，不茹葷，不顧家。靈通三界，可伏群魔。至仁宗明道癸酉年，承太上老君之妙敕，得至人神方之秘法，過敕妙所。于四月七日步罡呼氣，地震三聲，叱鹽盂水，扶降真童。彼時也，其性明暢，一視輒解。……傳靈寶經法，以救世人。夫如是，道能泰於邦家，恩能及於人物。神之聖也，太上其能無物色乎？至丙子年五月初三日，上帝聞其道德，命真人奉詔召本，本乘白鶴，白日升天。衣則道，冠則儒，劍在左，印在右，計在世五十八年。自升之後，世間或有望禱，應於物如扣鐘鳴，現於世如鏡明照。大事身現宮禁，小事魂夢形軀。矧思於方寸之內，依光於咫尺之間。是以諸將協力扶持，生民披肝而崇祀焉。

在上引碑文中，借助於「江仙官」降箕，記述了吳真人乃神仙下凡，而後修真得道、「奉太上老君之妙敕」、「傳靈寶經法」、「白日升天」等神跡，使之具有道教神仙的完整履歷。碑文中的「仁濟仙官江」，俗稱「江仙官」，據說原為吳本的高徒，從明初已分靈至南安，成為當地降箕的主神。在順治三年（1646）的《敕封仁濟醫局江仙君碑記》中，對此事的前因後果有如下記述：

有宋江仙君，世居廣省惠萊邑，生於興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卯時。……二五登第，初授泉銀同縣令，訪道宏理，時即棄官，拋家離邑，從吳真人，得道青礁而化。化時，封為「威武舍人」。乾道二年，封為「仁濟醫局仙官」。至洪武二年，分身武榮，箕筆懸樑，叩時即應。時黃縣令求之，箕雲：「門前三杆竹，屋後一口池。本是三胎子，奪長為男兒。」手指箕靈，一別而去。至萬曆戊戌歲，呼童攝箕，濟世疾苦，流傳於今。因吳真人謁祖進表，趙門樞、彥琦邀吳震環求表章，呼童降筆，咳唾珠玉，焚香叩請，應也如響。震環求余文以志之。余慕仙君道德全備，神靈不測，而知天地間無日不有陰陽。人所不能存者，天獨存之；天所不能存者，神獨存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豈其然乎？書之以垂不朽。

此碑的撰文者為「浯溪居士吳震交」，晉江縣人，明崇禎七年（1634）進士，官至揚州知府，清初歸隱於鄉；⁹而刻碑者為「彥琦男軾夫」，碑末署名為「武榮弟子」洪伯舟等十二人「焚香拜祝」，可能是當地主持降箕的宗教社團。如上所述，「江仙官」從明初分靈至南安以後，以顯靈降箕而聞名，但此後曾一度離去，至萬曆二十六年（1598），又再次「呼童降筆」。延及清初，當地信徒去慈濟祖宮進香時，仍是請「江仙官」降箕書寫「表章」。由此可見，從明初至明中葉，這一儀式傳統曾經中斷，至萬曆年間才再度復興。

一般說來，降箕是通過神靈附體書寫宗教文獻，因而是由神童主導的儀式傳統。不過，由於降箕需要具備一定的宗教知識和文化素養，與民間道士和士紳階層也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明清之際豐州慈濟宮的降箕活動，可以視為精英文化與庶民文化相結合的典型例證。

清代閩南各地的地方志，一般都記載了吳本的「保生大帝」封號及相關神話故事，而各地民間也流傳著各種「保生大帝」的傳記、譜系、廟志等通俗讀物。光緒年間，楊浚在《白礁志略序》中說：「鷺門林君廷瓚所紀吳大帝傳文，漳廈皆有刻本。中引顏蘭《吳真君記》，未見原書，或林本所采多顏記語也。」¹⁰所謂「顏記」，收錄於嘉慶《同安縣志》，雖然題為《吳真君記》，但也記述了吳本為皇后治病及受封「萬壽無極保生大帝」的事跡。¹¹所謂「林本」，編撰於道光年間。道光二十八年（1848），海澄生員顏清瑩在《保生大帝傳文序》中說：「瑩不敏，忝鄉先賢之胄，不惜重貲，共新廟貌。因購大帝之傳文，廣布當世，俾當世得所觀瞻者，復知其懿行。」他所刊佈的《保生大帝傳文》，即為「鷺門林廷瓚手輯之書」。¹²

清代漳泉地區還流傳《保生大帝真經》、《保生大帝簽譜》等道教文獻，¹³對民間的吳本信仰也有深刻的影響。《保生大帝真經》的大致內容是：元始天尊與太上老君在太清宮中演經說法，指稱人間時值末世，「諸佛涅槃，賢聖隱伏」，妖魔橫行，凡夫俗子災難深重。於是，天尊「乃推窮歷數，考究讖言」，演成經法，「永鎮魔兵」；而老君「復敕秘訣靈符一百二十道」，令吳本下凡，「傳佈經法，救度群生，同歸大道」。吳本下凡之後，又作有「神咒」，以之調兵遣將，「蕩滌群凶」。如欲得到吳真人的庇護，必須舉行「誦經」、「書符」、「念咒」三種儀式。據《白礁志略》記載：「相傳此經專治時疫，誦之可為眾生解厄。」為此，在經文中對信徒們提出以下具體要求：

今傳靈寶經法以救世人，若有男女得吾真經妙印，信受供養。或請僧道轉

誦，或結會讀誦，廣令傳說，求心所願，無不遂意。若人開築井、灶，架造宅、墓、豬、羊、牛、馬、雞、鴨棲欄，或有時氣疫病，可以香花、燈、茶、異果供養，持誦此經，連念吾咒七遍，以朱砂書吾傳示符訣如法，敕向門上，災鬼自消，人員自泰，所求稱心，咸登道岸。

在上述經文中，尚有「扶降真童，宣說此經」、「真童說已，籲魂而悟」之類的詞句，可

見這些經文也是以降箕的形式編造的。換句話說，在清代吳本信仰的傳播過程中，地方教派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吳本的「保生大帝」封號，可能並非來自明王朝的賜封，而是出自地方教派的虛構。自明代以來，由於各種地方文獻的輾轉記述，使吳本的「保生大帝」封號及其效忠於國家的靈異傳說廣為傳播，形成了當地民間的共同歷史記憶。在這一個案中，我們不僅可以追溯神明正統性的建構過程，也不難發現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

註釋

- ¹ 現存的宋人有關記述，主要為龍溪人楊志和永春人莊夏的《慈濟宮碑》，參見鄭振滿、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銘彙編》（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泉州府分冊卷七，頁952-955。關於吳本的生年，楊志與莊夏都記為太平興國四年；至於吳本的卒年，楊志記為景祐三年，莊夏記為景祐六年。由於景祐僅曆四年，當以楊記為是。
- ² 楊志，〈慈濟宮碑〉，引自鄭振滿、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卷七，頁952-954。
- ³ 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卷17150，〈禮二一〉。
- ⁴ 何喬遠，《閩書》（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卷30，〈方域志〉，頁274-275。
- ⁵ 此碑尚存南安縣豐州慈濟宮，碑文見於鄭振滿、

- 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頁619-621。
- ⁶ 此碑尚存南安縣豐州慈濟宮，碑文見於鄭振滿、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頁644。
- ⁷ 乾隆《泉州府志》，卷44，〈明列傳九〉。
- ⁸ 乾隆《海澄縣志》，卷24，〈叢談〉。
- ⁹ 乾隆《泉州府志》，卷50，〈明循績十四〉。
- ¹⁰ 楊浚，《四神志略》，〈白礁志略〉卷首，光緒十三年（1887）刊本。
- ¹¹ 嘉慶《同安縣志》，卷10，〈壇廟〉。
- ¹² 楊浚，《四神志略》，〈白礁志略〉卷2，光緒十三年（1887）刊本。
- ¹³ 楊浚，《四神志略》，〈白礁志略〉卷末，光緒十三年（1887）刊本。

行業神崇拜：香港粵劇行的華光誕

林萬儀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一、前言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不少行業都會奉祀一個以至多個神祇。時至今日，一些行業仍然延續著行業神信仰的傳統，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各種規模的祀神活動。探討這種文化現象的專著有李喬的《行業神崇拜——中國民眾造神運動研究》。¹此書審視了中國行業神崇拜的文化內涵，並介紹了多種行業神信仰。此外，周國強（Chow Kwok-Keung）撰寫的研究報告“Eastern Traditional Business Values: Mercantile Patron Gods in Hong Kong”，著眼於香港一個特定文化地域。²對於本文的研究對象——香港粵劇行的華光誕，周氏沒有深入討論，李氏亦沒有觸及。至於有關華光誕的研究，有論及華光誕賀誕劇《香花山大賀壽》的單篇文章，包括陳鐵兒的〈論「排場戲」〉³，林鳳珊的〈《香花山大賀壽》——吉慶劇〉⁴和區文鳳的〈粵劇例戲及牌子曲初考〉⁵。然而，這些文章都沒有把《香花山大賀壽》放在華光誕以至行業神崇拜的文化背景裡進行討論。因此，華光誕仍是一個有待研究的文化現象。筆者相信，對一個行業的崇拜活動進行微觀研究，除了可以對該行業的有關現象增加認識之外，亦有助於行業神崇拜的比較研究，了解行業神崇拜的共性與特性。這個考察報告是一個初步研究的總結。

二、作為行業神的華光

根據前人的研究及文獻資料，除了粵劇行之外，至少還有六種行業奉華光為該行的守護神。據李喬的研究，陶瓷業、搭棚業、武師以及一種稱為「八音」的彈唱行業都信奉華光。⁶在這四個行業中，「八音」與粵劇行關係較大。據清人徐珂的《清稗類鈔》：「八音者，以彈唱為營業之一種，廣州有之。所唱有生旦淨丑諸戲曲，不化裝，而用鑼鼓。」⁷八音行跟粵劇行一樣活躍於廣州一帶，

其從業員亦以唱戲營生，只是不敷粉墨。除了粵劇行之外，還有其他劇種以華光為行業神。陳守仁據《廣西地方戲曲史料匯編》指出，廣西地區的「採茶戲」班和「茶姑戲」班也信奉華光。⁸

就香港的情況來說，奉華光為行業神的除了粵劇行之外，據1960年代的兩則報章新聞，至少還有油燭紮作和武館兩種行業。⁹然而，在1970年代以後的報刊中，筆者只見粵劇行慶賀華光誕的報導，而不見以上兩種行業的有關新聞。可能這兩行再沒有賀誕，或者是沒有大型的賀誕活動，也可能只是沒有記者採訪，亦有可能是筆者仍未掌握有關資料。具體情況還待進一步了解。不過，自香港八和會館在1953年成立以來，基本上每年都有賀誕活動，而每年的誕期翌日或其後的數天之內即有報章報導有關的情況。粵劇行的賀誕活動得到傳媒特別關注，相信因為部分從業員是名伶，公眾對他們的消息感興趣。

至於華光的來歷，據黃兆漢和陳鐵兒的考證，華光是一位火神。¹⁰黃氏認為粵劇行奉祀華光是因為班中人認為華光可以保佑他們免受燭融之災。¹¹相信這與竹紮的戲棚易招火燭之禍有關。黃氏的觀點與陳守仁訪問的戲班成員所說的有相合之處，就是粵劇行的華光信仰與火有關。據陳氏訪問所得，香港的粵劇戲班流傳一個這樣的說法：玉帝不勝鑼鼓喧擾，命華光燒毀戲棚。華光為戲班的精采演出而著迷，不忍下手，於是教戲班燒香、化寶，使煙火燻上天庭，讓玉帝相信戲棚被焚，戲班因此逃過一劫。粵劇從業員自此將華光奉為守護神。¹²

粵劇行對於華光有不同形式和規模的崇拜活動。每次演出前向華光上香敬拜是戲班成員的習慣。經常上演粵劇的新光戲院後台有一個常設的神壇，流動性的職業戲班則有一個專門收納神牌和香案等祭祀物品的箱子，以便在臨時搭建的戲

棚內設置神位。在香港的粵劇行會——香港八和會館的辦公室內有一座比較大的神壇，每天都有香火。一些從業員甚至在家裡供奉一尊華光像。最大規模的集體性崇拜活動莫如一年一度的華光誕。

三、賀誕活動

在香港較為人熟知的神誕，有農曆正月初二的車公誕，三月初三的北帝誕，三月廿三日的天后誕等。粵劇行的華光誕是農曆九月廿八日。

筆者分別於2003及2004年對華光誕做過兩次實地考察。¹³兩年的活動和程序都大同小異。由於筆者在再次考察時有了第一次的經驗，觀察和紀錄都做得較好。因此，以下將根據2004年的考察所得概述華光誕的活動。

賀誕活動在正誕日的子時展開，翌日子時結束，為期一天。

2004年11月9日晚上十時三十分，亦即農曆九月廿八日子時將要來臨之前的半小時，筆者按照會方建議的時間準時抵達首項賀誕活動的現場——八和會館的辦公室。當時，常設於辦公室的神壇上已備齊燒肉、雞、鮮花、水果、酒、茶、香燭等，在神前演戲所需的戲服、道具和樂器也逐一排列在旁備用。參予祭祀的八和弟子亦陸續抵達。

十一時正，八和正、副主席即率領眾人在神前逐一上香，然後領取象徵華光賜予的吉祥紅包。領過紅包，其中八人連忙穿上扮演八仙的戲服，聯同四名樂師在神前獻演《八仙賀壽》。接著，其中一人立即換上另一套戲服，獻演《加官》。然後，由三名在演出《加官》期間已換妝的演員獻演《仙姬送子》。這三齣短劇都有吉祥的含意，演《八仙賀壽》一方面藉著扮演八仙向神祝壽，另一方面藉此讓參與賀誕的人沾染長壽的福兆；演《加官》則意味著天官賜福予參與賀誕的人；演《仙姬送子》的意思是祝願參與賀誕的人多生貴子。¹⁴這三齣短劇幾乎是所有粵劇神功戲必有的環節，並非華光誕獨有。後文將要提到的《香花山大賀壽》則基本上只有在華光誕才上演。

一連三齣吉祥短劇演罷後，正、副主席就在會館門外化寶，請神的儀式繼而展開。三名習演武師

的弟子分別捧著一尊從神壇請下來的華光像，¹⁵一塊寫上華光、田、竇、天后、譚公和張騫五位菩薩的神牌，以及一支引路的長香，在噴吶聲和鑼鈸聲中步出會館，自三樓拾級而下，鬧哄哄的從繁華的彌敦道轉入永星里與鴉打街交界，登上預先停候在那裡的一輛小型客貨車。上車後，樂師暫停奏樂。三位主席登上一部房車。筆者被邀跟隨主席的座架。其餘弟子就此撒離。從主席上頭香至此，時間才過了十三分鐘，儀式的簡捷可想而知。

在同一個晚上，北角新光戲院後臺外的一條內街上，另一批八和弟子早已架起一個臨時性的神壇恭迎華光及列位菩薩駕臨。三位主席率先在十一時三十六分抵達，先行打點。不久，請神的隊伍亦隨後而至，喧鬧的樂聲自下車一刻再度響起，直至護駕的弟子把菩薩送到神壇之前。他們小心翼翼地吧神像和神牌安放妥當，然後又在神壇正面的上端掛起一條大紅神花。當供品也放置妥當之後，主席就帶領弟子逐一上香，接紅包，然後化寶。至此，請神的儀式已告完成。十一時四十五分，眾人陸續撤走，後臺外側的街道上只留下一位徹夜看守神壇的弟子。

翌日清晨八時半，筆者抵達新光戲院後台，看見負責賀誕活動的弟子陸續抵達。他們例必先到神壇上香，然後才按照各自的崗位準備下午的酬神戲。當天，上香之後不但有紅包，還有一道蓋有華光寶印的靈符。寶印放在神壇旁邊的一張桌上，讓弟子自行蓋在自己及家人的汗衣上，平日或練功時均可穿著，據說穿了之後可保平安。弟子取過紅包、靈符，蓋過寶印，也循例添些香油錢，一般是五圓、十圓或二十圓。有的則送來酬神金豬。在戲院的前後臺，眾弟子都為當天下午向華光呈獻的兩齣戲忙個不停。將要響鑼的時候，正、副主席走到神前化寶。下午二時正，動用逾五十名演員，長達個多小時的《香花山大賀壽》揭開序幕。壓軸戲是「劉海灑金錢」。扮演劉海的演員把象徵財富的銅錢時而灑向臺下，時而散在臺上，在場的所有人，包括台上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台下的八和弟子及其眷屬、嘉賓都爭相檢拾銅錢，人人興奮莫名，真是人神共樂。主持好不容易才把眾人的情緒穩定下來。接著，台上再演一齣情節和表現手法都比較豐

富的《天姬送子》。四時甫收鑼，眾弟子立即打點一切，驅車前往九龍尖沙咀的海洋皇宮大酒樓，準備當晚的聯歡聚餐。

率先請進宴會廳的當然是華光及列位菩薩。從戲院到酒樓這一程，弟子對戲神依然是必恭必敬，只是沒有樂隊隨行演奏。臨時搭建於新光戲院的神壇也分件拆下來，運到酒樓重組。神壇就設於這家酒樓特有的舞台側。赴宴的人不論是八和弟子抑或是他們的親友、戲迷、嘉賓都可以在這裡上香和領取紅包及靈符。晚上七時，兩位主持人站到台上，先對去年出資支持八和的各界人士表示謝意，並向他們致送紀念金牌，然後展開競投福物的環節，藉此為八和籌募資金。開席不久，一件件供品都從神壇上拿出來競投。台下一眾八和理事不斷穿梭於八十多桌筵席之間極力邀請嘉賓出價。競投活動一直舉行至散席為止。十八件福物分別由港澳粵劇、曲藝界人士，本地影視藝人及社會名流投得（表一）¹⁶。連同各項贊助款額計算，整晚合共籌得港幣九十三萬八百八十八圓。

至此，賀誕活動已接近尾聲。晚上十一時過後，賓客和八和弟子都陸續離開酒樓，華光和諸位菩薩亦在當晚送返會館。一年一度的華光誕就此圓滿結束。

四、重頭戲：《香花山大賀壽》

在各種賀誕活動中，《香花山大賀壽》具有比較特別的意義。這台戲集合了行內眾多成員的力量，他們以從事這個行業所需的技藝呈獻於神前，為神祝壽。當中一些技藝更是平日難得一見的。壓軸的一場「劉海灑金錢」，更把觀者的情緒推至最高點。因此，《香花山大賀壽》是華光誕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可說是一場「重頭戲」。此外，這齣戲基本上只在華光誕上演，除非買戲的一方特別要求演出。下文將扼要介紹這齣戲的情節及演出情況。

全劇的情節相當簡單，敷演的只是觀音得道，宛如重生，眾仙一同前往祝壽的故事。然而，由於當中不少技藝的鋪陳，當日的演出長達一小時五十分鐘之久，過往的演出時間更長。¹⁷

整齣戲分為八場。首先是八仙在雲海景中各持

法寶依次出場，逐一自報家門後，由賀壽頭漢鍾離擔綱念白，相約帶備仙桃仙酒一同前往祝壽。第二場由八仙女各持紙板花瓶一對，在花林景中表演象徵種花、開花、結子的舞蹈，繼而以手中花瓶砌出「天、下、太、平」四個大字。第三場是扮演水晶宮裡的魚、蝦、龜、蚌的演員模仿各種動物特有的動作先後出場，接著是來自東、南、西、北四方的海龍王逐一自報家門，然後由東海龍王擔綱念白，相約一同前往賀壽。第四場由金童、玉女在雲景中伴隨普陀聖母、梨山聖母和龜靈聖母出場，三聖母自報家門後，由梨山聖母擔綱念白，相約一同前往祝壽。第五場由水簾洞裡的孫悟空與眾猴子表演翻騰跌撲的毯子功，繼由孫悟空擔綱口白，相約一同前往花果山採摘仙桃仙果前往祝壽，然後眾猴抬出一隻比人還要高的大桃。接著，八仙各持寶物再度出場，他們碰上拿著賀禮的金童、玉女和三聖母，雙方約好一同前往祝壽。四龍王亦隨後而至，眾仙於是一同前往祝壽。第六場有善才、龍女各拈「慈航普渡」旛和「西方極樂」旛在紫竹林中，觀音妙善自報家門，八仙、四龍王、三聖母先後出場，齊天大聖率領眾猴抬著大桃上場，眾仙同向觀音跪拜，觀音與眾仙打道菩提岩。第七場是大頭佛的獨腳戲，以南天門為背景，表演晨起梳洗、打掃、添油、點燈、點香等。第八場是壓軸戲，首先是降龍、伏虎和韋陀三羅漢分別表演功架。然後是「觀音十八變」。名為「十八變」，實在只得八變。由扮演觀音的演員及另外八名分別扮演龍、虎、將、相、漁、樵、耕、讀的演員合作完成。觀音先後換妝八次，全是女妝。觀音每一次以新妝出場，都會透過形體動作模擬上述八種化身的形態，完成一套動作後即返回後台換妝。觀音一走，扮演該種化身的演員立即上場，表演相關的功架，如穿虎衣的作虎狀，作樵夫打扮的作砍柴狀。觀音再次出場前，又有打武家的演員表演各種翻騰跌撲的絕技。打武家的絕技雖然與劇情無關，只作間場，但最能博取觀眾的掌聲。完成「十八變」後，就有招財、進寶二仙伴隨劉海出場大灑金錢。眾人爭相檢拾象徵財富的仿古錢幣，掀起高潮。最後打武家演員挑著大桃上場，

壽桃忽然打開，跳出一名扮演桃心的演員向觀音祝壽，在即將完場之前再為觀者帶來一個驚喜。

五、結語：華光誕的獨特性

華光誕的連串活動在在反映了從業員希望得到行業神守護的心態。在華光誕中，既有一般性的祈求，也有與行業相關的。前者如紅包寓意吉祥，靈符保平安，銅錢招財等。後者如聯歡聚餐的菜單上把乳豬取名「紅透半邊天」，競投韓湘子的洞簫時，主持說該洞簫寓意高聲響亮。

此外，華光誕雖然有一些環節比較嚴肅，例如請神儀式；但整體上都洋溢著一片歡樂的氣氛。呈獻給神的賀誕劇，人也看得興奮莫名。聚餐更是明正言順地讓同業與親友聯歡的場合。華光誕與其他神誕一樣有神人共樂的意圖及效果。

再看神壇香火不絕，賀誕劇陣容鼎盛，聯歡宴席人聲鼎沸，足見華光誕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凝聚同業，提高士氣，增強歸屬感的作用。資深的八和弟子慨嘆，往日的華光誕，幾乎人人都穿著蓋上華光寶印的練功衣，很有團隊精神。據當日所見，幾乎只有在台上專門表演高難度動作的武師穿了華光寶印衣。不過，在筵席之間為福物穿梭求價的一眾八和理事也特別穿了一式的洋服。或許團隊精神已今非昔比。然而，華光誕至少提供了一個名目和一個場合，讓八和弟子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行業神崇拜的行業性也體現在透過崇拜活動聚集同業，以處理同業事務。八和會館在華光誕的聯歡宴上通過競投籌集會館所需的資金，也算一種同業事務。此外，2003年的華光誕舉行了兩年一屆的理事會就職典禮，亦為一例。¹⁸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華光誕有著行業神崇拜的一般特徵。¹⁹然而，粵劇行作為一個特定的行業，其行業神崇拜也有其獨特性。就行業神崇拜的內涵而言，華光誕的獨特性在於酬神戲與技藝的展示、交流和傳承的結合。李喬注意到，在不少行業神崇拜的場合中，同業都會趁機展現技藝，互相觀摩。同時，酬神戲也是行業神崇拜常備的環節。²⁰不過，其他行業需要外聘戲班代演。戲行同業的技藝正是演戲，粵劇藝人平日經常代人向神獻戲，在華光誕則為自家的神獻戲。《香花山大賀壽》的獨特

意義在於此戲保留了粵劇的傳統功架和技藝，如降龍架、伏虎架、韋陀架、觀音十八變，砌字等。這些功架和表演方式在今日的演出中已甚少看到。藉著一年一度的華光誕，傳統技藝得以展現、交流和傳承。

此外，賀誕活動中還有兩種現象體現了祀神與演戲的關係。其一是請神儀式中所奏的樂曲——《大開門》（又名《水龍吟》）。這是一個戲台上常用的曲牌，用於渲染主帥升帳，重臣升堂等莊嚴宏大的戲劇場面。²¹在誕期中借用於迎神的儀式中，以顯示華光的位高和襯托場面的莊嚴。其二是《香花山大賀壽》中八仙、降龍、伏虎、韋陀三羅漢以及劉海所持的道具法器，八和弟子都視作福物。在演出前，這些演戲所用的道具都懸掛於神壇之上，演出後則拿來競投，每一件都被賦予吉祥的寓意。

戲行基於歷史、地域等因素產生了不同的行業神崇拜傳統。對不同劇種的行業神崇拜活動進行探討和比較，將是未來研究的一個方向。

表一：2004年華光誕競投福物所得款額及福物之寓意

福物	吉祥寓意	競投所得款額
1. 呂洞賓之寶劍	鎮宅	\$80,000
2. 漢鍾離之寶扇	沒有提及	\$50,000
3. 何仙姑之寶荷花	如花美艷	\$32,800
4. 李鐵拐之寶葫蘆	沒有提及	\$33,800
5. 藍采和之寶花籃	沒有提及	\$38,880
6. 張果老之魚鼓筒	沒有提及	\$23,800
7. 曹國舅之測板	沒有提及	\$30,000
8. 韓湘子之洞簫	高聲響亮	\$23,800
9. 伏虎羅漢之伏虎圈	治邪、鎮宅、保平安	\$30,000
10. 降龍羅漢之降龍珠	治邪、鎮宅、保平安	\$38,800
11. 韋陀之降魔劍	治邪、鎮宅、保平安	\$30,000
12. 韋陀之降魔杵	治邪、鎮宅、保平安	\$44,800
13. 劉海之金錢	發財	\$62,800
14. 花瓶	花開富貴	\$23,800
15. 走馬燈	一路光明，財源滾滾	\$30,800
16. 七星燈（由七個蓮花狀燈盞組成）	一路光明	\$36,800
17. 萬里長紅（神壇上的紅色神花連長帶）	生意興隆	\$50,000
18. 聚寶盆（附加神壇上的肥雞乙隻）	生財	\$90,000
	總額	\$750,880

註釋：

- ¹ 李喬，《行業神崇拜——中國民眾造神運動研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 ² Chow Kwok-Keung, *Eastern Traditional Business Values: Mercantile Patron Gods in Hong Kong* (東方傳統企業價值：香港的行業神崇拜)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Studies, Lingnan College, 1997)。
- ³ 陳鐵兒，〈論「排場戲」〉，載黃兆漢、曾影靖編訂，《細說粵劇——陳鐵兒粵劇論文書信集》（香港：光明圖書公司，1992），頁98-99。
- ⁴ 林鳳珊，〈《香花山大賀壽》——吉慶劇〉，載區文鳳編，《香港八和會館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八和會館，1993），頁87-89。
- ⁵ 區文鳳，〈粵劇例戲及牌子曲初考〉，載區文鳳編，《香港八和會館成立五十週年特刊》（香港：香港八和會館，2003），頁77-84。
- ⁶ 參見李喬，《行業神崇拜——中國民眾造神運動研究》，頁144，158，475，529。
- ⁷ 轉引自李喬，《行業神崇拜——中國民眾造神運動研究》，頁528。
- ⁸ 參見陳守仁，《神功粵劇在香港——儀式、信仰、演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1996），頁11-12。
- ⁹ 參見〈紙業扎作工會——昨祝賀師傅誕〉，《文匯報》，1961年11月7日，內文：「港九油燭紙業扎作職工會，昨（六）日慶祝該業華光師傅誕」；又參見〈夏漢雄健身院 祝華光師傅誕〉，《星島日報》，1968年11月19日。
- ¹⁰ 參見黃兆漢，〈粵劇戲神華光考〉，載《道教與文學》（台灣：學生書局，1994），頁155-189；陳鐵兒，〈八和會館戲神考〉，載黃兆漢、曾影靖編訂，《細說粵劇——陳鐵兒粵劇書信集》（香港：光明圖書公司，1992年），頁215-225。原載於《大成雜誌》第69期，1979年8月。
- ¹¹ 參見黃兆漢，〈粵劇戲神華光考〉，頁182。
- ¹² 參見陳守仁，《神功戲在香港：粵劇、潮劇及福佬劇》（香港：三聯書店，1996），頁38。
- ¹³ 2003年的農曆九月廿八日即西曆10月23日，2004年則是11月10日。
- ¹⁴ 關於《八仙賀壽》、《加官》和《仙姬送子》，參見陳守仁，《神功粵劇在香港——儀式、信仰、演劇》，頁61-67。關於扮仙戲，可參見王嵩山，《扮仙與作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
- ¹⁵ 神壇上原本供奉著一大一小的華光像，請下來的是較小的一尊。
- ¹⁶ 表中所謂「競投所得款額」是當晚司儀宣報的數字。從刊於區文鳳編的《香港八和會館四十週年紀念特刊》的「一九九二年（壬申）恭賀華光先師寶誕暨第廿六屆職員就職典禮收支表」可見，該年度有未收款項，另1987至1991年度有若干競投項目列作壞帳。
- ¹⁷ 參見黃鶴聲導演，《觀音得道，香花山大賀壽》（鐳射影碟）（香港：志聯影業有限公司，1966）。
- ¹⁸ 就筆者考察所見，2003年舉行的是香港八和會館第三十一屆理事會的就職典禮。
- ¹⁹ 關於行業神崇拜的特徵，可參考李喬，《行業神崇拜——中國民眾造神運動研究》，頁22-35。
- ²⁰ 參見李喬，《行業神崇拜——中國民眾造神運動研究》，頁98，107-113。
- ²¹ 參見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詞典》編輯部編，《中國音樂詞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水龍吟」條，頁363。

《申報》所見的兩則香港史研究資料

林國輝
香港史研究者

《申報》創刊於1872年4月30日，是上海第二份中文報紙，¹時間晚於香港的《遐邇貫珍》（1853年創刊）、《中外新聞》（1858年創刊）和《華字日報》（1864年創辦），但其創辦過程卻與香港有密切的關係。首先，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在決定辦報後，曾派錢昕伯到香港向王韜學習，王韜當時在《華字日報》工作，錢與王在上海時已相識，後更娶王氏女為妻。²《申報》在創辦之初，就以「本報自述」形式來介紹《華字日報》，盛讚該報成績可觀，特別提到主筆黃勝和王韜才華出眾。³

其次，《申報》在創刊首日，即選譯香港「三月十九日新報」消息，實為廣東新聞兩則，⁴早期香港報紙所刊載的「中外新聞」，除了報導外國大事之外，還涵蓋香港及鄰近廣東地區的消息，轉載香港報刊的內容，表明《申報》博採外地消息的立場。⁵

《申報》創刊初期主筆錢昕伯既為王韜女婿，王氏在香港創立《循環日報》時，《申報》亦作報導，日後更經常選錄《循環日報》的論說，兩報社論間中亦有互相呼應。⁶隨著分銷網擴張，《申報》於1881年已在上海以外的十七處地方（包括香港）設有「訪事員」，⁷香港的消息可從《申報》上讀到。

香港華文報紙雖然早於19世紀50年代創刊，但歷經戰亂、報館興替和各種災變，現存早期報刊資料缺失甚多。就以《華字日報》為例，該報館於1894年時曾經歷火劫，「舊存報紙，盡遭焚燬」。⁸香港大學圖書館現只存1895年1月以後的《華字日報》，但脫期嚴重，而早期的《循環日報》亦只收藏1874年至1886年的部份期數。相反《申報》的保存情況則較為理想，大部份印行的《申報》仍有影印本或微縮膠卷傳世，其中轉載香港早期報紙的內容雖然不多，但卻彌足珍貴，為我

們了解香港社會發展的情況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以下兩則原見於香港《華字日報》的新聞，就是其中的例證。

例一：〈將軍澳罷市（選錄香港華字日報）〉，
《申報》，1874年2月26日。

距港之東有將軍澳者，一小村也。土人負販其間，漸成市廛，近來諸物雲屯，頗稱暢旺，朝廷立有營汛於此。設官守土，職有專司，邇日粵海關部派有巡船至此緝查。蓋以防商船估帆，道經其地者，或有偷漏也。是亦重國課之一道。前日傳聞其地商民有停止貿易之說，則以輯私人苛索漁船陋規也。先是其地多業漁者，烟蓑雨笠，戴月披星，寄以一葉孤舟，出沒淇波巨浪間，緝私差役恆至，索其供養母，每艘收取銅錢二百八十枚，幾於家喻而戶曉，有所得藉以飽貪囊，適者有新至一漁船，不知其弊，差役至索，置著罔聞，以為釣月鈞雲，得魚換酒，乃世外生涯耳，豈有餘錢供人揮霍哉。且我輩中有逼於窮乏者，方且衣食無從為計，妻女飢號，塞之不暇，乃欲割肉醫瘡，以應汝求，差役怒甚，以為汝何人，斯敢與我抗，于是斥糶詈不已，又從而笞撻之，漁人飲泣不敢校，商民見之，大為不平。其地有凌姓設帳授徒者也，耳其事出，而為之排解，差役遷怒於凌，逐肆毒毆，凌負傷頗劇，旋差役又繫以鐐銀，凌當時欲思控官，驗傷以憑存案，而身為差役所羈，苦不得脫，如鳥在籠，如猿在檻，其苦萬狀，被禁凡閱四日。商民聞之，不禁攘臂奮及，咸曰：是風烏可長

也。於是其市遂罷，凌乃得出，後凌以事顛末控官，官但加以撫慰，而事卒未辦。既而凌姓迭控於九龍司，新安令，復赴省上訴於府，尊太守以為如果屬實，自當徹底根究，而其事必由司官邑令，為之上詳，方可明白，勢不能越控也。越控即與健訟等。且事關地方公憤，眾民皆當聯名具稟，職司撫馭者當必為之保護。惟近日緝私差役，往往倚勢作威，妄行漁利，譬諸良民乃魚肉也。彼乃刀俎、吸髓、敲膏，無所不至，為上者，苟能盡心於民事，自宜亟為之伸枉理屈，挫梗安良，毋使此輩得行其鬼域，況其地距港不過咫尺間，倘消息傳聞，徒足貽笑西人耳。⁹

史料價值：

例一所提及的「將軍澳」位於香港之東，而且在新安縣境內，應是指九龍半島東面的將軍澳。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粵大記》的〈廣東沿海圖〉及萬曆九年（1579年）的《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均在「官富巡司」（當時香港地區的行政機關）附近記有將軍澳一地，後者清楚表示其地正對佛堂門，與今日將軍澳的地理位置相符，又註明「將軍澳可避颶風，至龍船灣半潮水，至擔竿州二潮水，至淘潭口一潮水。」可知當時將軍澳已是往來船隻停泊避風的港灣。清代中葉以後的中外地圖，亦多標有將軍澳一地，包括繪於1840年前後的中國海防形勢圖¹⁰、1868年「新安縣全圖」¹¹、1895年哥連臣地圖修訂本¹²及1897年《廣東通志》內的地圖¹³。

最近二十年，將軍澳經填海後，已開發為一個新市鎮，如果要了解將軍澳地區的歷史，只可參考地區組織出版的刊物，例如《西貢風貌》¹⁴、《西貢歷史與風物》¹⁵及《坑口區鄉事委員會金禧紀念特刊》¹⁶。其中《西貢歷史與風物》一書，透過訪問及碑銘資料，查明在19世紀後期，將軍澳的坑口村已經發展成墟市，憑藉水陸交通網絡的優勢，漸成為地域中心和市場中心，但墟市的名字未見於嘉慶年間編修的《新安縣志》，所以該書認為墟市的

興起，是在香港成為殖民地後，港島人口遽增，對漁穫和柴草等物資需求增加，才促進了坑口墟的發展。¹⁷這與例一所引的內容亦相符合，所謂「近來諸物雲屯，頗稱暢旺，漸成市廛」，將軍澳地區的墟市應是1870年代初才開始出現。將軍澳村位於坑口村以北的，但現存資料未提及將軍澳村曾建有墟市，¹⁸從實際地理位置及碼頭設置等考慮，坑口比將軍澳的水陸交通更為便利，所以該墟市應為「坑口墟」無疑。

將軍澳早於明代已為避風港，例一亦記：「先是其地多業漁者。」1889年張之洞《廣東海圖說》中談到「九龍寨」佈置時，亦特別提到「本港無漁船，惟附近將軍凹有漁船十餘號」。¹⁹可知清朝時該地為漁船的理想停泊處，今坑口天后廟旁仍存有大井一口，相傳為昔日漁民汲水之處。然而從例一引文所見，當粵海關在區內增派緝私人員時，這些漁戶卻慘成巡艇丁兵的剝削對象，並向每只漁船徵收二百八十錢。

清代同治年間，駐港官兵主要由鎮守九龍寨城的大鵬協水師副將統帶，左營中軍駐大鵬城內，右營守備駐東涌，兩營下屬汛兵分守各處，並協助海上巡邏。²⁰香港割讓後，境內走私鴉片問題嚴重，為此兩廣總督瑞麟允許運載鴉片的民船於東莞、香山等地繳納厘金後轉銷內地，並於1868年在香港東西兩面水域的長洲及佛頭洲設立厘卡，加派駐蒸汽巡艇，專責徵收鴉片厘金和加強緝私工作。²¹1871年6月粵海關監督亦參照同樣佈置，在香港水域的佛頭洲、汲水門、九龍城及長洲設立稅廠，向中國貨船徵稅，並備有新型緝私船，打擊走私漏稅。²²

清廷緝私人員在香港水域附近截停中國船隻，原只對未完稅的貨品及鴉片徵稅，但後來變成無論是外省至港貨輪，還是香港至澳門的船隻，皆向其強徵貨稅。²³巡艇對往來船隻的騷擾，早引起港督麥當奴（Sir R. G. MacDonnell）及港商不滿，並要求英國政府正視這個影響香港商貿的問題，與中方交涉。²⁴這就是政府檔案中提到的「封鎖香港」（Hong Kong Blockage）事件，擾攘近二十年，直至1887年厘卡由總稅務司管轄下的海關接管後，事件才告一段落。²⁵

例一所提到的「營汛」，可能是指1871年後進

駐的緝私兵丁，坑口天后廟內1876年重建碑記亦有「將軍澳汛千總李弼臣助銀伍大員」²⁶的記載，但考境內其他碑銘及同治年間的《廣東圖說》，皆沒有「將軍澳汛」的布置，²⁷結合碑銘與例一的記載，這個「營汛」應是為配合緝私而在1871年後建立。然而在英國檔案裏，這些兵丁時有強行充公船隻，或插贓誣巖之事，藉機中飽私囊。1883年勞士法官（Mr. Justice Russell）給港督寶雲（Sir George Bowen）的報告中，就把清廷巡丁描述得如同強盜，並列出漁艇被充公的個案，說明「封鎖香港」的遺害。²⁸例一則從另一角度，暴露駐軍紀律不嚴，魚肉鄉民的劣行。

當日將軍澳居民對緝私差役的不滿，更觸發罷市抗爭。先是漁戶拒不納款，而飽受拳腳之苦，商民已感不平，後來凌姓私塾老師為漁民排解而遭巡勇痛毆，銀鐺入獄，引發商民罷市，一時民氣沸騰，終使凌姓老師獲釋。文中說到這位私塾老師被拘留四天，釋放後往「控官」，但對方要求息事寧人，於是先後到九龍司、新安縣令作控訴，皆未獲受理，故最終要上訴到廣州府，但又被指為「越控」而不被接納，而且威嚇他「越控」等同「健訟」。根據嘉慶二十年定的律例條文：「生員不守學規，好訟多事者，俱斥革。按律發落不准納贖」，²⁹刑罰頗重，可見地方官皆不想審理此案，並作出威嚇。從這個案例可知，境內海關巡丁得到地方官的包庇，益使他們橫行無忌，而這段有關九龍居民罷市抗爭的記載，不見於過去選編的香港史料，值得注意。

例二：〈記香港醮會（選錄香港華字日報）〉，
《申報》，1872年9月5日

港地連日醮會之舉，恭迎列聖鑾輿，鎮遊街巷，絲竹管絃之盛，則有洋洋盈耳之笙歌，衣冠錦繡之儀，則為落落大觀之人物。二龍飛舞，將欲躍淵見田，五鳳跨遊，恒願凌霄接□。□歷紫薇之巷，燕舞翩翩，東過蘭桂之芳，馬騰簇簇，旌旗歷亂，真堪耀目炫神，翡翠迷離，亦足賞心快志。又況會□花果，盤設孟蘭，宣佛法於無邊，啟壇

場之浩蕩，結若蜃樓，不少繭絲蟬殼，幻成海市，居然萬戶千門，鶯院花香，宏招蝶使，法場善廣，遍誦菩提，羽衣則說道德之言，五千一貫；比丘則證如來之法，萬億歸虛。奪目張燈，風來則有聲鏗鏘爾，迎神結彩，雅化則靜寂肅然，將見識六如之道，咸登歡喜之鄉，空三昧之心，眾拔憂愁之國矣。○本港賽會之設，有以稚年小子，巧裝昔人故事，使之騎馬遍歷街衢，以為樂趣者，殊不足觀。況當炎天赤日，煩苦備至，在彼小子，實有慘不可言，乃父若兄，又何忍樂而為此風會之陋習，真可怪哉！

史料價值：

例二首段用駢文格式寫成，詞藻華麗，語意較隱晦，但所記為1872年香港孟蘭醮的情況，其中包括有神輿行列出遊，穿街過巷的情景，亦提及到誦經超幽的宗教儀式，與今日孟蘭節的基本內容相同。太平山的孟蘭勝會似早於1856年已舉行，³⁰隨著19世紀70年代本地華人社會日漸壯大，經濟發達，節日慶典亦愈見規模，且耗費甚巨。王韜旅居香港近二十年，對當時孟蘭節的各項安排亦留有深刻印象，所謂「孟蘭盆會盛行於今而莫知其所自始……以近今各處，所見之最盛者，莫如粵東。以香港蕞爾一區，每歲舉行是會，約費萬金，裝嚴炫麗，莫與為比，斯楊盈川之賦所不能形容者也。司事者，捐集各行鋪戶之銀，歲必盈一萬四、五千金，盡以供裝嚴，其捐之大小，以送燈多少別之，首選者，所懸之燈自屋至地，輝耀街衢者以為榮，此習俗使然也，以一孟蘭會，揮手千金，嘻！可謂豪舉矣，然謬亦甚矣！」³¹

香港與上海同樣有大量外地移民，農曆七月旅居上海的廣東商人亦會辦孟蘭盆會，耗費甚巨，同樣成為《申報》的新聞內容：「本埠每屆中元令節，閩、廣、寧、紹各幫，均設孟蘭盆會，熱鬧異常，茲以邑尊早經出示禁止，誠恐人多易於茲事也。然各幫仍照舊例，即如新聞之廣東會館，所設之會極形華美……并恐或有失慎，預設洋龍數架，

先事防閑。往觀之人，靡不摩肩擦背。」³²地方官員禁止市區內舉行傳統慶典，深怕好事之徒，乘機聚眾生事端，但主事者依舊大事鋪張，民眾則熱烈參與，這與官方謹慎的態度，造成強烈對比。正是這種反差提供一個討論空間，而孟蘭盆會這類民俗活動，亦得以佔據上海及香港報刊的版位。

報刊上的民俗資料，對於我們了解昔日的都市風情，大有幫助。特別是討論地方風俗傳承時，這些文字記載，又成爲口述歷史資料以外的根據。就以香港銅鑼灣潮洲公和堂的孟蘭勝會爲例，首屆法事據說在1897年舉行，³³筆者暫時仍未見到相關的文獻資料。不過上引王韜對孟蘭盆會的論述，則早見於1875年所刊行的《甕牖餘談》，當日會場可能設在中、上環一帶。與兩者相較，例二所引《申報》的報導，是目前爲止最早關於香港島上孟蘭盆會的中文記載，說明同類民俗活動，至少在香港市區已經流傳達135年。

例二末段關於「扮色」的記載，同樣具有相當參考價值。清代廣東地區多個縣市皆有以兒童裝扮色的風俗，其中包括佛山、香山及東莞，³⁴惟獨未見於《新安縣志》。長洲飄色據說要到1930年代末才成爲太平清醮巡遊的一部份。³⁵不過從

這段文字可見，一種類似「地色」的活動，早於1870年代，已成爲迎神賽會的一部份，但「扮色」的孩童並非被抬在轎上，而是騎馬出遊，不過採訪者的角度，仍然是烈日之下出游，孩童需要忍受痛苦，與今日的報導手法相類。

關於香港地方風俗的源流，往往憑當今主事人的記憶，或依靠文人筆記、碑銘資料和官方檔案內零星資料，才可得知其點滴。早期的報刊的記載，實在可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申報》自1872年4月30日創刊，至1945年5月27日終刊，橫跨大半個世紀，1984年上海書店曾整套影印出版，合共四百冊。後來廣東檔案館選輯其中有關廣東、港澳、桂東、湘南、贛南及閩西的內容，編成《〈申報〉廣東資料選輯》³⁶，一套共十七冊，收集範圍包括香港新聞，給香港史的研究者帶來不少方便。如要利用《申報》內有關香港的記載，這套資料自然成爲最便捷的工具書，但其中仍有不少遺漏，例如上引「將軍澳罷市」一文，就未被收入。加上原書卷秩浩繁，選輯過程中誤抄錯植，亦在所難免，使用時要倍加留心。據知上海書店已決定重印《申報》，或可於2008年推出，如果能同時推出電子版，相信更能發揮《申報》的功用。

註釋

¹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年），頁3。

² 同上，頁24。

³ 〈本館自述〉，《申報》，1872年5月8日。

⁴ 《申報》，1872年4月30日。

⁵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8。

⁶ 〈書《申報》中輿論後（選錄香港《循環日報》）〉，《申報》，1874年11月28日。

⁷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58。

⁸ 原見陳止瀾《〈華字日報〉七十一週年紀念刊》，今轉引自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25。

⁹ 爲方便閱讀，例一及二之原文皆由筆者標點。

¹⁰ 哈爾·恩普森（Hal Empson）著，《香港地圖繪製史》（香港：政府新聞處，1992年），頁102。

¹¹ 同上，頁114-115。

¹² 同上，頁136-137。

¹³ 同上，頁117。

¹⁴ 《西貢風貌》編輯委員會編，《西貢風貌》（香港：西貢區議會，1995年）。

¹⁵ 馬木池等編，《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03年）。該書第二部分第二節以〈從坑口墟到將軍澳新市鎮〉爲題，介紹19世紀以來將軍澳地區的發展歷程。

¹⁶ 《坑口區鄉事委員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坑口區鄉事委員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坑口區鄉事委員會，2007年）。

- ¹⁷ 馬木池等編，《西貢歷史與風物》，頁56。
- ¹⁸ 將軍澳村的歷史參見B.V. Williams, "The Chan Family of Tseung Kwan O", in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 (1967), 158-159. 但由於族譜等文獻資料缺乏，這篇短文主要根據訪問資料寫成，其中提到將軍澳村陳德亨（1828-1891）曾在佛山開店，並擁有一艘往來九龍及佛山的貨艇，曾協助興建坑口碼頭。而根據1905年的土地登記，他的兒子陳惠堂（估計生卒年為1872-1933年）在坑口則擁有四間店舖及一間屋。2008年初該村父老陳友根先生與筆者傾談時，亦表示從未聽聞將軍澳村曾建有墟市，反而表示村外水淺，難以停泊船隻，過往漁船都集中在坑口。
- ¹⁹ 張之洞著，《廣東海圖說》，頁28-32。現轉引自馬金科，《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頁54。
- ²⁰ 桂文燦纂，毛鴻賓、郭嵩燾等修，《廣東圖說·新安縣圖》（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頁154-155。
- ²¹ 陳新文，〈「封鎖香港」問題研究（1868-1886）〉，《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173-191。另見Memorandum on the "Hong Kong Blockage" for the Information of Governor Sir George Bowen, G. C.M.G. (26 August 1883) by Mr. Justice Russell.
- ²² 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志》（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67。
- ²³ 〈西人論粵垣巡船之非〉，《申報》，1874年8月15日。
- ²⁴ 〈論香港緝私事〉，《申報》，1874年6月24日。
- ²⁵ 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志》，頁68。
- ²⁶ 《香港碑銘彙編》誤記為：「營將軍澳況千總李弼臣助銀伍大員」。
- ²⁷ 同治年間新安縣的營汛，包括鹽田、沱灣砲臺、大鵬城、九龍砲臺、佛堂門、糧船灣、九龍海口、瀝源港、塔門、九龍寨、石筍砲臺（即汾流）、深水埗、大嶼山、青龍頭、長洲、青衣、東涌、坪洲、蒲臺、沙螺灣、大濠、急水門、梅窩、榕樹灣等處。見《廣東圖說·新安縣圖》，頁154-155。
- ²⁸ Memorandum on the "Hong Kong Blockage" for the Information of Governor Sir George Bowen, G. C.M.G. (26 August 1883) by Mr. Justice Russell. 「封鎖香港」的詳情，可參看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8-195 & 213-214. 除上引陳新文著作外，另可參看劉存寬，〈19世紀下半葉的九龍中國海關及其交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138-151。
- ²⁹ 《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年），第九冊，卷七二四，〈刑部·名例律〉，頁13。
- ³⁰ "The Districts of Hongkong and the Name Kwai-Tai-Lo", *The China Review*, No. 5 (1873), 334.
- ³¹ 王韜，《甕牖餘談》（據光緒元年（1875年）版影印）（台北：廣文書局，1969年），卷三，頁十三。王韜〈香港論略〉亦記：「每歲中元，設有盂蘭盛會，競麗爭奇，萬金輕於一擲。」見氏著，《弢園文錄外篇》（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63。
- ³² 〈蘭盆勝會〉，《申報》，1876年9月5日。
- ³³ 香港大學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http://www.hku.hk/sociodep/oralhistory/2/2.2.1.3.html>）。
- ³⁴ 丁世良等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頁701，742及807。
- ³⁵ James Hay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Hamden: Archon Books, 1977), 73. 但Charles J. H. Halcombe的遊記中，1890年代文武廟的巡遊已見有類似飄色的裝置。參見Barbara-Sue White, *Hong Kong: Somewher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0.
- ³⁶ 林忠佳等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廣州：廣東省檔案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編輯組，1995年）。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霍英東研究院華南研究中心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合辦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通識教育碩士課程
資助

南沙與大澳地方社會田野考察工作坊

藉著田野考察的方式來瞭解人類行為與社區歷史、文化和環境的關係，是通識教育的重要環節。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特於今年七、八月期間舉辦南沙與大澳地方社會田野考察工作坊，供通識教育碩士課程之校友及同學參加。詳情如下：

活動一：南沙田野考察工作坊

日期：活動1A：2008年7月5日及6日（星期六及日）

活動1B：2008年8月3日及4日（星期日及一）

活動1C：2008年8月16日及17日（星期六及日）

內容：考察南沙鹿頸村、黃閣鎮

住宿：南沙資訊科技園迎賓樓

人數：20人（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費用：免費（三百元按金）

活動二：大澳田野考察工作坊

日期：活動2A：2008年7月31日（星期四）

活動2B：2008年8月4日（星期一）

活動2C：2008年8月28日（星期四）

內容：考察大澳社區內的大澳歷史文化室、商業街、棚屋區、鹽田遺址、廟宇。

人數：20人（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費用：交通及活動費用全免；60元（午膳費用）

查詢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郵：schina@ust.hk

第六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 招生启事

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第六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拟于2008年7月至12月举办。本届研修班得到英国研究理事会中国办事处（RCUK-China）、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资助。研修班旨在通过系列讲座、圆桌讨论、田野工作实习和实地调查等系统训练的环节，培养新一代历史人类学研究人才，推动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邀请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研修内容及时间安排：

1、7月16日至22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上课和研讨。邀请英国、美国、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知名大学的12位知名学者授课，分别讲授“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传说与区域社会史研究”、“民间契约文书的收集与解读”、“族谱：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宗教文书与乡土社会”、“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与台湾研究”、“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考古学与民族学”、“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等专题，并进行研讨。

2、7月23日至30日，在福建省西北部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实习。

3、8月初至12月底，研修班的参加者自行选择田野调查点分头开展调查工作，并完成田野调查报告。主办单位收到田野调查报告之后，经审查合格，发给主办单位签发的研修班结业证书。

二、费用：研修班免收报名费，正式学员集中研修和调查期间的费用由主办单位提供，包括参加者的往返旅费（火车硬卧）、在广州和闽西北的食宿交通费用；此外，研修班将为正式学员在自己的调查点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一定数额的经费补贴。旁听学员所有费用自理。

三、学员资格：主要招收中国大陆各高等学校文科相关专业在学研究生，同时招收少量35岁以下的大学青年教师或博士后研究人员。欢迎海外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报名作为旁听学员。

四、招生人数：正式学员30名，旁听学员10名。

五、报名程序：有意参加者请于2008年6月30日以前报名（报名表请于<http://ha.sysu.edu.cn/2008summerschool/index.htm>下载）。主办单位将在2008年7月5日以前告知遴选结果，并发出正式的邀请信。

六、联系办法：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黄晓玲小姐
邮政编码：510275
电话：(86)20-84114831或84114832
传真：(86)20-84112122
E-mail: hshac@mail.sysu.edu.cn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霍英東研究院華南研究中心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主辦

認識珠江三角洲歷史與文化工作坊(第四期)

自明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漸漸發展出獨特的地方組織、文化、風俗習慣及語言，構成其主流形態。華南有悠長的移民歷史，不少民眾移居東南亞、歐洲及北美等地。這個區域不單具有研究地方文化與社會的優越地點，更是一個探討海外華人遷徙歷史的理想脈絡場境。

這項計劃的目的在於增廣本校學生瞭解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文化和社會，親身經歷當地農村生活和最近十多年間急劇的社會和文化變遷，並學習歷史學的檔案和文獻研究及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方法。

對象：香港科技大學學生

日期：2008年8月5日至14日

地區：霍英東研究院及珠江三角洲南沙區

目的：瞭解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村生活、地方歷史面貌和變化。

方法：以小組為單位，進入社區中，在村民導師的帶領下，
認識農村的環境、活動、歷史和地方傳統。

內容：講授、小組討論、田野考察和提交報告。

住宿：南沙資訊科技園招待所。

費用：免費（伍佰元按金，工作坊完結後全數發還）

查詢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郵：schina@ust.hk

霍英東研究院華南研究中心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電話：(020)34685622 傳真：(020)34685623

《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五卷第二期（2007年10月）

專論

- 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1740)（李文良）
 清季民初一個粵東地方讀書人的歷程——以羅師揚(1866-1931)為個案（梁敏玲）
 身體的爭奪：1950年代後期的江南血吸蟲病防治——以青浦縣為中心（孫琦）
 「你倆是我倆一輩子的丈夫」——黔東南苗族情歌語言的兩姓意象與結伴理想（簡美玲）

述評

- 民眾叛亂、社會秩序與地域社會觀點——兼論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森正夫）

書評

- Anthony J.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何鑒菲）
 Maria HEIMER and Stig THØGERSON eds., *Doing Fieldwork in China*（張琚）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申斌）
 黃國信，《區與界：清代湘粵贛界鄰地區食鹽專賣研究》（黃壯釗）
 Wen-Hsin YEH,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陳莉）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形象表述》（丁蕾）
 李孝悌，《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和生活》（李甜）
 Thomas HEBERER, *Doing Business in Rural China: Liangshan's New Ethnic Entrepreneurs*（鄧剛）
 羅興佐，《治水：國家介入與農民合作——荊門五村農田水利研究》（梁勇）

第五卷第一期（2007年4月）

水利專號

- 利、害博弈與歷史恩怨——蕭山湘湖社會史的變遷軌跡（錢杭）
 爭奪水權、尋求證據——清至民國時期關中水利文獻的傳承與編造（鈔曉鴻）
 塘堰與灌溉：明清時期鄂南鄉村的水利組織與民間秩序——以崇陽縣《華陂堰簿》為中心的考察（楊國安）
 本地利益與全局話語——晚清、民國天門縣歷編水利案續解讀（周榮）
 近代洞庭湖區的湖田圍墾與水利糾紛——以沅江白水澗閘堤案為例（鄧永飛）

書評

- Engseng HO, *The Graves of Tarim: Genealogy and Mobil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衛思韓）
 郭德焱，《清代廣州的巴斯商人》（周文娟 蔡香玉）
 Leo. K. SHIN,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唐立宗）
 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謝曉輝）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黎恩）
 周建新，《動蕩的圍龍屋——一個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與文化抗爭》（謝宏維）
 林拓，《文化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陳瓊芝）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E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蔡偉傑）
 周大鳴，《鳳凰村的變遷：《華南的鄉村生活》的追蹤研究》（麻國慶）
 唐力行等著，《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卞利）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1853-1938)是廣東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伙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簿」、代理合約一份、札單17張及商往來書信83件。亨泰號合同2份，年結1本及商業往來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376件公司記賬紀錄，189件銀行及錢莊票據，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資料彙編》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收錄宋怡明(Michael Szonyi)搜集有關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資料。這些資料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各類專家，如道士、說書者、演傀儡戲者所提供的資料；第二種是五帝信徒所提供的經文、教旨以及碑銘等資料；第三種是旁觀者描述五帝的資料，如地方官僚或西方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彙編》定價：港幣100元

本書收錄鄧聖時所存自1993至2002年間有關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在稔灣之祖墓搬遷事件中各方面的來往信函、文件、資料和會議記錄。全書共輯錄文獻151條。

訂購表格

歷史人類學學刊	機構				個人				學生			
	US\$		HK\$		US\$		HK\$		US\$		HK\$	
一年共兩期	50		350		30		220		20		150	
兩年共四期	100		700		60		440		40		300	
叁年共六期	150		1050		90		660		60		450	

請以 X 選出合適的項目。上述價格為折扣價，已包括平郵郵費。

開始訂閱期號：第_____卷第_____期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定價	折扣價	訂購數目	合計
1. 劉志偉編《張聲和家族文書》	HK\$80	HK\$64	本	HK\$
2.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	HK\$80	HK\$64	本	HK\$
3.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	HK\$120	HK\$96	本	HK\$
4.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	HK\$120	HK\$96	本	HK\$
5. 張小軍、余理民編《福建杉洋村落碑銘》	HK\$120	HK\$96	本	HK\$
6.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	HK\$80	HK\$64	本	HK\$
7. 廖迪生、盧惠玲編《風水與文物》	HK\$100	HK\$80	本	HK\$
小計			本	HK\$
(郵費 + 書價) 合計			HK\$	

香港本地免郵費，海外訂購，每本另加港幣10元，作為平郵費用。

若以美元付款，請以HK\$7.5 = US\$1折算。

付款辦法：

附上支票/銀行本票* (US\$/HK\$) * _____，支付「香港科技大學」"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請圈出合適者)。

請在我的信用咭帳戶扣除US\$/HK\$ _____

我將以右列方式支付款項： VISA MASTER CARD

信用咭號碼 _____ 有效期至：_____

持咭人姓名：_____ 持咭人簽署：_____

請把書刊寄往：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Email: _____

請寄回訂閱表格往：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Name)：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_____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_____

電話(Phone)：_____ 電子郵箱(E-mail)：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歐冬紅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